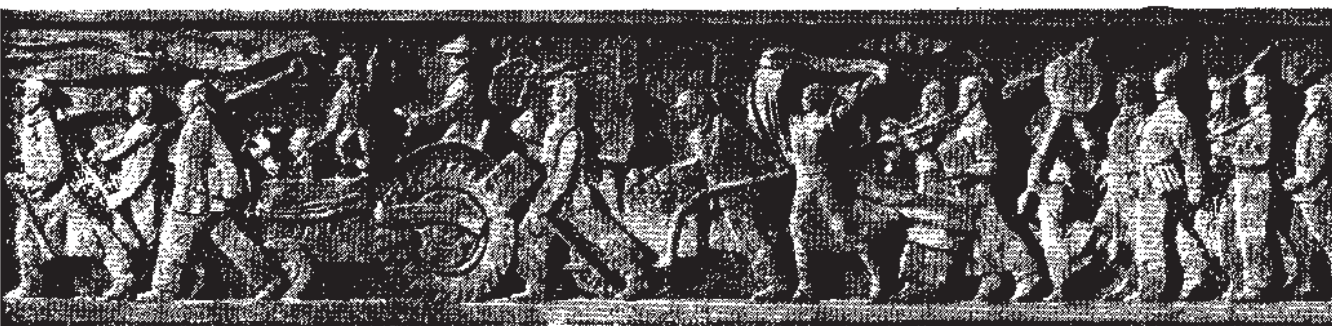


红旗

HONGQI



一九五九年 10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五九年第十期 ★

目 录

短 论	包产一定要落实.....林一舟(1)
	农业生产措施要同群众商量 决定.....洪禹(3)
	为了追求真理.....施东向(32)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薛暮桥(7)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翦伯赞(21)
	关于水电和火电问题的讨论.....李锐(34)
	自动化在帝国主义国家里.....杨重光(45)
	编者的话.....(31)



包产一定要落实

林一舟

领导农业生产，組織今年农业生产的繼續跃进，要抓許多环节；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是包产。

包产，是公社和生产队、社員之間的一种協議，一种合同；也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法。公社根据包产数字拟定农业方面的收益分配方案。公社以下的核算单位(生产大队或者生产队)根据包产数字来支配由自己管理的各种收支。超过包产的部分，絕大部分或几乎全部归包产单位的社員群众所有。包产数字又是国家分派农产品征購任务的一个重要依据。通过包产数字的拟定，就使一年的生产和分配的輪廓更加明朗化，使生产的增加和生产者收入的增加更直接地联系起来，使国家利益、公社集体利益和社員个人利益更好地結合起来。通过包产体现出来的这种清楚明白的生产和分配的关系，农民熟悉、妇孺皆知。根据过去的經驗，只要处理得好，就会对生产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包产問題解决得好不好，关键在于包产指标是否落实。包产指标不应当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空想出来的。在确定包产指标的时候，决不能以願望作为根据，以感想代替实际；不能以为指标定得愈高愈好，不能把亩产在实际上只能达到五百斤的，定

成一千斤，一千五百斤，甚至更多，实际上做不到。必須对去年当地各种土地上的产量多少，去年比前年增产多少，今年能够增产多少，有什么可靠的增产措施，等等方面的实际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調查和分析。在切实估計到当地人力、物力、財力的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既要看到各种有利条件，又要看到实际存在的困难条件，并要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使計划指标尽可能地符合实际或接近实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同群众进行充分的討論，共同作出决定。因为一般群众对当地土地和生产上各种实际条件的了解，比干部是会要清楚些。当然，其中也有某些有保守观点的人，但是，一般說来，农民群众对自己耕种的各类土地要采取什么措施以及因此可能达到的产量的估計，是比较实际，比较可靠的。而且，要克服群众中的某些保守观点，也只有依靠实际的經驗，首先是依靠一批試驗的結果。

經過群众討論，才能反映群众要求，集中集体智慧，使包产指标成为领导与群众共同决定的指标。这样，包产指标才能真正为群众所掌握，真正成为群众实际行动的奋斗目标，才能鼓舞他們的干劲，激励他



們的生产积极性。包产指标能否达到，全靠社員的双手，全在于他們干劲的大小和积极性的高低。經驗証明：凡是群众不同意、不接受的計划和指标，勉强实行，硬着来做，往往是行不通、办不到的。

有人担心，这样一来，群众会把指标压得很低。当然，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小集体和大集体的矛盾，这是需要相当時間才能逐步解决的問題。这种矛盾，有时表现为小集体的本位主义，有时表现为大集体的过分集中。当前情况必須注意的，是某些上級的干部对生产指标层层加码，要求过高，同时，对小集体的利益照顧不够，对生产的领导过分集中。因此，必須說明：包产指标如群众不同意就不能算数。小集体和大集体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种利益的一致性它們共同商量問題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是能够达成一个大家都比較满意的协定的。

包产中有一个留有余地的问题。现在很多地方在包产的时候，把包产指标定得比实际可能达到的产量低一些（例如低百分之十到二十），給包产的生产小队或者生产队留下超产的余地，使他們真正有可能超产，因而有奖可得，从增产中得到較大的实惠。我們认为这种办法是完全对的，因为这样做，可以大大鼓励和刺激农民群众的增产积极性。切实关心群众的利益，时刻想到使我們的政策措施适合群众的要求，这是我們党和毛澤东同志所一貫坚持的原则；我們必須在确定包产指标这一类的問

題上，認真贯彻执行这个原则。至于群众当中有少数或个别的人可能产生的指标愈低愈好、留的余地愈大愈好的、不尽合理的、本位主义的想法，通过共同商量討論，在群众对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一致性認識的思想基础上，是可以克服的。对增产的实际可能性估計不足，把指标定得太低，因而使生产措施松懈下来，这种偏向也是要尽可能地防止和纠正的。

我們強調包产指标要切合实际，也就是为了使自己的两脚踏在实地上，使生产跃进建立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我們的工作才有把握，基层干部和社員群众才会真正下决心、有信心去完成和超额完成所定的指标。指标愈切合实际，他們这种决心和信心也就愈强，跃进的劲头就会更大。相反地，如果超过实际可能，自己根本无把握，群众根本不相信，这同真正的跃进是毫不相干的。过高的指标，脱离实际的指标，不但不能鼓励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反而会挫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因为指标定得过高，誰也达不到，只是說說而已；如果定得切合实际，是經過努力可以达到的，群众就会認真对待，爭取实现。

包产指标落实以后，我們对产量就有个最低限度的可靠的把握，国家征購、公社积累、社員分配等等的绝对数字，就可以比較实际地預定下来。这样，干部心中有底，工作主动；群众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干活有劲，許多事情都会好办得多。这样，我們整个計划指标的实现，就会更有保証。



农业生产措施要同群众商量决定

洪 禹

农业生产措施是否恰当，是一个对于作物生长和收成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也是一个直接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要问题。福建日报一篇通讯所提供的材料，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福建南安县卫星公社满山红大队的生产措施，由于同群众共同商量决定的结果，实行了“丘丘田地合理密植”的科学方法，因而使今年早稻的生长情况十分良好。这篇通讯说，现在那里已经是“丘丘葱绿、丛丛粗壮”，而且每丛稻苗分蘖达到“二十多本”（按：本，即枝或条）。

根据他们的经验，生产措施应该适应不同的条件而有所不同。比如密植问题，他们全大队一千零八十亩早稻田，就有六种不同的密植规格。有一个小队的七十三亩早稻田就分为三类，而且每类田根据土质肥瘦、地势高低、作物品种特性等不同条件，又分出各种不同的插秧规格。对于肥沃的田地，由于促使秧苗分蘖的力量较强，密植程度就要低些。分蘖力强的品种，每丛秧苗就要少插些，而容易倒伏的品种，就应该插在较瘠瘦的土壤上，等等。有的田比去年插得密些，有的和去年一样，有的比去年疏些。总之，种植太疏了不好，

太密了也不好。

象满山红大队这种细致地、一块块土地分别对待的生产措施，决不是少数人坐在屋子里凭着好心的愿望可以想得出来的，而是采取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方法，组织了当地的老农、青年、壮年、妇女、干部，采取了小会讨论、登门访问、田头商量、大会定案等一系列的办法得出来的。可见，具体的生产措施问题，决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去作硬性的规定，而是应该集中当地农民群众的意见，共同商量决定，因为群众最熟悉当地自然条件的错综复杂、千差万别的情况，最熟悉每一块土地应该怎样耕种。

由于这些生产措施是经过群众商量决定的、是群众自觉采取的，因而能够充分激发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正如这篇通讯所说的，满山红大队的社员们，由于生产计划、生产措施是同他们商量决定的，所以他们“口通、心通、手通”，满怀信心地进行中耕除草，加强田间管理，掀起积肥高潮，积极抢救受灾的庄稼。那位半夜冒着暴风雨到山田里排水的老大说：“现在生产是共同研究、共同决定、共同负责、共同执行的，还能眼看庄稼受灾不救吗？”社



員們認為，今年密植規格有他們的“一份主張”，他們“一定要力爭各項措施的實現”。這些情況說明，滿山紅大隊的社員們是在以他們堅定的意志和積極的行動，力爭今年早稻的丰收。

此外，我們看到有一個關於福建海澄縣蓮花公社密植措施的材料，其中說：該縣要求農民群眾插秧時執行硬性規定的統一密植規格，弄得群眾和幹部都很為難。但是，五一生產大隊的支部根據當地的情況和群眾的要求，變通了縣級的規定，決定按照當地的合理密植規格插秧，群眾非常高兴，渾身是勁，原來計劃清明以後七、八天才能完成插秧，後來他們自己提出了保證，要在清明前完成任務；本來規定早晨五點起床，有的人一點多鐘就起來干了。

可見，在絕大多數的場合下面，並不象有些人所擔心的，同農民群眾共同商量決定生產措施，會產生“落後、保守”，會使群眾“缺少干劲”。

從滿山紅、五一大隊和其他各地的經驗看來，由於土、肥、水、種、氣候、地點等等自然條件的不同，以及農民耕作經驗、技術水平和田間管理水平高低的不

同，農業生產的技術措施，決不能千篇一律。象滿山紅一個地方就有那麼許多差別情況，至於全國各地當然更是千差萬別。比如蕃薯究竟插雙行還是單行的問題，我們從其他材料上看到，福建省的另一個公社，去年的經驗是：沙質地里的薯塊又大又美，粘濕地里的薯塊不大又有臭薯。根據這種經驗，他們今年就採取分別對待的辦法，沙質地插雙行，粘濕地插單行。可見，農業的具體生產措施，甲地的規格，對於乙地就不一定適宜。

有些人以為，生產措施的規格是愈統一愈好，他們沒有估計到，一種統一的規格不可能適應於千差萬別的耕作條件。而且，密植等類措施，如果不和農民商量，不注意當地當時的條件，不注意他們的具體經驗，正如前面所說，不只會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還會很大地影響幹部同群眾的關係，也影響幹部本身的積極性。經驗證明，為了使我們的農業生產計劃指標具有充分可靠的現實可能性，同時，又使農民群眾對於實現指標具有高度的積極性，從而達到增產的目的，一定要將生產措施問題，連同生產指標問題，一起經過同農民群眾充分商量，再作決定。

附：滿山紅大隊幹部和群眾 共同制訂密植方案

南安衛星公社滿山紅大隊，制訂早稻密植方案 and 生產計劃時，與社員

群眾共同商量、共同決定、共同負責、共同執行，做到生產民主，措施落實，



社員心情舒暢，生产搞得很好。

反复商量，干部、群众 共同制訂密植方案

这个大队今年为了繼續大跃进，早在去年十二月就发动社員广泛討論、总结一九五八年农业大跃进的經驗，来制訂今年繼續大跃进的生产规划和合理密植等增产措施。在制訂早稻密植方案时，各生产队以食堂为单位分别召开了好几次社員大会，发动社員各抒己見，暢所欲言。挺进小队老农尤世川說：“上級号召我們农民要增产，农业‘八字宪法’每个字我們都拥护。”但怎样贯彻农业“八字宪法”，他認為應該大家商量办事，密植不能千篇一律。如火秦壩的一片平原田，去年插得过密，丛行距 3×3 寸（按：被乘数是行距，乘数是从距。下同），結果亩产才二百斤。比同等田地插 6×4 寸的产量差了一大半。經過充分討論后，全大队的社員初步提出了八种密植規格。为了統一意見，把密植方案訂得更切合实际，党支部組織各队选派老农、青年、壮年、妇女、干部等各方面的代表，集中討論，根据地区土地、品种以及其他自然条件和去年的成功經驗，共同商量密植的丛行距，决定采用 5×4 寸， 5×5 寸， 6×4 寸， 6×5 寸， 6×6 寸， 7×6 寸等六种規格，然后又拿到社員大会上再度討論，最

后定案。社員們看到干部再三征求群众意見，十分高兴，連老人、妇女都相繼参加討論，七十三岁的老社員尤世象兴高采烈地抱着小孙子到会上参加討論；过去很少說話的老农尤世川也一手提灯、一手扶拐地来到会上积极发言，他說：“生产講民主，有我一份，我怎能不作参謀呢。”挺进生产队的社員們，晚上討論后，連夜拿着尺子到田里認真測量計算，确定合理密植規格。在社員再度討論的同时，各队干部还挨家挨戶登門訪問、征求意见，有的在食堂，在田头，甚至在跟社員一起拾粪时，也和社員共同商量，征求对这六种密植規格还有沒有修改意見；直到大家同意后，才最后定案。东方紅生产队社員陈貴长說：“今年密植規格有我一份的主张，也是大家出的主意，我們一定确保各項措施的实现，力爭早稻大丰收。”美滿生产队老农陈季匣說：“生产大事應該由干部和群众共同商量，这样人多計謀深，才会考虑更周到，粮食大丰收才更有保証。”

群众口通、心通、手通 丘丘田地合理密植

滿山紅大队和社員共同制訂密植方案后，又在插秧之前，召开社員大会，放手发动群众，討論了因地制宜地合理密植。因此社員心情舒暢，主动



認真執行密植規格，做到了口通、心通、手通。挺進小隊有七十三畝早稻田，社員把它分作三類：第一類是平原田，分三種不同規格插秧，在塘口一片黑土壤，土質好，插 6×5 寸和 6×4 寸；在壩內一片也是黑土壤，但土質更肥沃，分蘗力強，則插 7×6 寸。第二類是半山田，也分兩種規格插秧，在壩后一片是赤土壤，土質比較差，不易分蘗，就插 5×4 寸；在高雄的一片同樣是赤土質，但地勢比較高，分蘗力比較強，則插 5×5 寸。第三類是沙質土的山田，也分兩種不同規格插秧，有的插 4×4 寸，有的插 5×4 寸。全大隊一千零八十畝早稻田地，在社員自覺執行密植規格下都因地、因品種、因自然條件合理密植。在五百五十九畝山田和半山田，有的田地比去年插得密一些，有的田地維持去年的密植程度，有的田地還比去年插得更稀一些。例如三十五畝肥沃的門口田和溝頭田，去年採用 5×3 寸密植，由於插得過密，結果每畝平均只收四百九十斤，比山田的產量還低，今年根據老農意見稍為放寬些，按 7×6 寸密植，結合加強管理，合理追肥，促進大量分蘗，以保證每畝有一定有效穗數。

各種稻田除了分別採用了不同密植規格外，還根據各種條件，因地制宜地採用了不同本數，如南特號分蘗

力較強，每叢插八至十本；粳稻和紅米早分蘗力較弱，每叢插十至十二本。容易倒伏的南特號，插在較瘠瘦的田地，不易倒伏的粳稻插在較肥的田地，促使各種品種都能在適宜的田地上正常成長。

稻苗挺秀，社員滿懷信心爭取夏季大豐收

滿山紅大隊放手發動群眾推行合理密植後，全隊插秧進度很快，比去年提早一個季節插完早秧。目前丘丘蔥綠、叢叢粗壯，稻苗每叢已分蘗到二十多本。社員們滿懷信心地在稻田里中耕除草、加強管理，並掀起了積肥新高潮，每天積制火燒土、綠肥、衛生肥等二千多担，準備給早稻田增追更多的優質肥料，爭取夏季大豐收。石橋生產隊以老農、技術員為主組成田間管理專業隊，認真研究稻子生長情況，保證管好稻田，前幾天一個午夜，突然刮大風下暴雨，挺進生產隊老農尤傳貓被風雨吵醒後，立即點着燈、拿着鋤頭跑到一里多遠的山田去排水，直至下半夜一時排完了田水才回家，使稻苗免受損失。他向老伴說：“現在生產是共同研究、共同決定、共同負責、共同執行的，還能眼看庄稼受災不救嗎？”

（福建日報，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 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薛暮桥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向我们经济科学工作者提出了一项新的任务，就是深入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其中包括研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所发生的作用。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出版，在我国引起对上述问题的学习热潮。当时我国还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生产还广泛存在，这是没有问题的，谁也不会怀疑。但是，在当时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生产，除受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外，是否还受国家计划控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对它们是否也起作用？对这些问题却是有争论的。

在一九五六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已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又进一步展开。当时讨论的中心是：国营工业所生产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是不是商品？商品生产的范围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还有多大？价值规律在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中是否还占重要地位？这些问题经过几年的讨论，虽然还没有得到一致的意见；但大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水平无疑是显著地提高了。不用说，这些问题在理论上的正确解决，对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是有重要意义的。

人民公社的诞生，使商品生产有了若干新的变化，有些人在认识上曾经一度陷入混乱状态。有些同志认为，人民公社已经接近于全民所有制了，而且快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因此他们认为商品生产快要消亡，价值规律也快要不起作用了。他们的根据是：第一，既然人民公社实行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方针，它就可以发展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大体上满足公社和全体社员在生产上和生活中的需要，因此就不需要再发展商品生产了。第二，既然人民公社实行了工资制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随着供给部分的迅速扩大，而供给部分又采取实物形式，因此不久以后，就没有必要采用商品



货币的形式来进行消费品的分配了。第三，有些同志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农民就再不会计较收入的多少，国家同公社的交换就不必要遵守等价的原则，甚至可以无偿调用公社的产品和劳动。这些混乱思想如不迅速澄清，将为国家和公社带来重大的损失。因此，在这时候，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研究，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着叙述上的便利起见，我对这个问题的说明，将先从社会主义的交换关系的具体分析开始，说明我对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问题一般的看法，然后回到人民公社化以后所提出的关于商品生产的一些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三种性质的交换

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劳动产品，除了一部分自给性的农产品外，一般都要经过交换过程，才能从生产领域达到消费领域，完成从生产到消费的全部过程。社会主义的交换关系，是由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决定的；但交换关系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交换关系的研究，将使我们对社会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获得更具体的认识。

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产品所以必须互相交换，不仅由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必须有数以万计的企业来分工生产各种社会产品，这些企业在生产中必须互相交换其产品；更加重要的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两种生产资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且还存在着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进行分配的制度。这样就使这些社会产品的交换，一般地还必须遵守商品交换所通行的原则。在社会主义社会，大体上存在着三种不同性质的交换。

第一，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与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或公社）之间的交换，或者这一个合作社（或公社）同那一个合作社（或公社）之间的交换。交换的双方，是生产资料和产品不同的所有者，它们各自以自己的产品去同对方进行交换；经过这种交换，产品就从这一个所有者转移给另一个所有者。这样的交换，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不是以获得利润为目的的交换，因而同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的性质根本不同。但是，由于它还是两个不同的所有者之间所进行的等价交换，所以它同一般的商品交换还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第二，国家把国营企业所生产的消费品和从合作社（或公社）购买来的消费品，经过交换分配给千百万消费者，这是另一种性质的交换。这种交换与前一种交换不同，不是产品同产品的交换。在这里，消费者并不提供任何产品，他们提供的只是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和由此取得的一定数量的货币。交换的过程不是“产品——货



币——产品”，而是“劳动（为自己劳动部分）……货币——产品”。因此这种交换，实质上是消费品的一种分配方式。但是，这种交换同样要遵守等价（等量劳动）的原则，而且消费品经过这种交换，就从国家所有变为消费者个人所有，可以由消费者来自由支配。因此，这种投入市场的消费品，同一般的商品也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第三，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同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这种交换形式上同第一种交换类似，但实质上经过交换以后，商品的所有权并没有转移，仍然是国家所有。不过在现行的经济管理制度下，由于这些国营企业都是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都必须各自计算盈亏，所以在交换时候，一般地仍然必须遵守等价的原则。从这个意义来说，这种交换同一般的商品交换也有部分类似的地方。

在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时候，把这三种交换关系明确区别开来，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因为它们是在不同的条件下产生的，并通过交换来达到不同的目的。国家必须采取不同的政策，来对待这三种不同性质的交换。

第一，两种所有制之间的交换，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因为：（1）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业生产主要属于全民所有制，农业生产主要属于集体所有制。只有通过这种交换，国家才能够取得集体所有制经济所生产的农产品，从而掌握全部社会产品，进行有计划的调配；集体所

有制经济才能够取得国营企业所生产的工业品（包括它们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 and 它们的社员所需要的消费品）以满足生产和生活上的需要。（2）在存在着两种所有制的条件下，只有等价交换，才能保证交换双方的应得的利益，才能最有效地鼓励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的产品，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要按照国家计划，用商品的形式出卖给国家。在交换中价格的高低，对人民公社的收入多少有相当重大的影响。在现阶段，这种商品交换仍然有继续发展的趋势。即使农村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不会改变产品的交换部分继续扩大的趋势；不过由于所有制的改变，这种交换的性质也将跟着改变，即从前面所说的第一种性质的交换，变为第三种性质的交换了。

第二，国家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由于按劳分配制度的存在，也显得十分重要。只要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提供劳动要取得报酬，领取各类消费品要支付代价，这里就存在着等价交换的必要性。在按劳分配制度下，社会产品还不丰富，劳动人民之间生活水平的差别，以及各人的需要和嗜好不同，不通过商品货币形式而直接进行实物分配，这简直是不能想象的事情。我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所以大部分采取实物分配的形式，这与目前农业中自给性的生产还占优势有关。经过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产品中的商品性部分不断扩



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生活需要也更加复杂的时候,就有必要逐步缩小实物分配的部分,扩大通过商品货币形式进行分配的部分。从最近苏联集体农庄逐步改行货币工资制度,我們已經可以看到这种趋势。只有到将来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可以过渡到按需分配的时候,通过商品货币形式来进行分配的办法才有可能逐渐消亡。

第三,国营企业和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也是完全必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各国营企业互相依存,必須互相交换其产品才能不断地进行再生产。同时,为着保证生产的不断发展,必須督促各企业进行严格的经济核算。为着经济核算,各企业在互相交换其产品的时候,也必須采取等价交换的原则,使它們在生产中消耗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能够得到补偿。这种交换关系一旦中断,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够繼續生产。如果交换时候不采取等价的原则,价格想高就高,想低就低,就会使国民经济陷入混乱状态。

社会主义社会各个国营企业相互之间的等价交换,与国营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等价交换,国家和消费者之间的等价交换的性质是不同的。在后两种交换中,价格的高低,都会影响某些劳动人民应

享受的物质利益。比如,农产品采购价格的高低,不但会影响公社的收入,而且会影响它的社員——农民的收入;消费品零售价格的高低,也会影响工人、职员和农民的收入。因此,等价交换是为保证劳动人民应得的利益,是为保证按劳分配原则的正确实现。国营企业相互之间的交换,价格高低虽然也影响各企业的收入,但除少量的奖金外,基本上并不会影响企业中职工的收入;因为他們的工资标准,同企业盈利的多少无关。但是,在两种所有制并存,和实行按劳分配制度的条件下,前一种交换和后两种交换总是要互相影响的。特别在目前的情况下,国家为着督促各国营企业增产节约,改善经营管理,也采取了各种物质鼓励的办法。各国营企业在努力完成国家所规定的生产计划的同时,还必须努力完成盈利上缴的任务,并力争超额提奖。它們在互相交换中,也不願意讓自己吃亏。因此,各国营企业相互之间的交换,从整个国家来说,已經是国家内部的产品分配所采取的一种方法,是利用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产品的分配;但从各个企业来说,它們在交换中同样必須在一定的程度上計算各自的物质利益,因而同一般的商品交换也沒有十分重大的区别。

社会主义国家的价格政策

前面講的三种不同性质的交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基本上都采取等价交

换的原则。只有等价交换,才能保证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出售其产品以后,能够换回



同量价值的产品；保证劳动人民用他们的货币工资，能够换回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扣除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相等数量的消费品；保证各国营企业在生产中消耗的生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能够得到补偿。所谓等价交换，就是每一种产品都按照它的价值（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进行交换。

社会主义国家各类产品的价值，还必须用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因而还必须为各类产品规定适当的价格。社会主义国家的价格政策，基本上应当以各类产品的价值为基础，尽可能符合于生产这些产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但是，由于各类产品的价值难于精确计算，而且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中，价值本身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价格背离价值的现象，还是不断会发生的。某些特殊的政治经济情况，也可能使价格在一定范围内背离价值。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必要经常研究价格政策，必要时也要用调整价格的办法，来调整某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数量，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以及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具体办法是：

第一，利用价格政策来影响某些产品的生产数量，以保持各类产品供需之间的平衡，和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各类产品的生产，基本上是由国家计划来调节的；但国家在调节各类产品的生产数量的时候，必须正确掌握价格政策。特别对集体所有制经济所生产的各类农产品，正确掌握价格政策更有重要意

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确规定工业品同农产品的比价，和各类农产品相互之间的比价（如粮食同棉花的比价）；必要时可以用调整比价的办法，来影响各类产品的生产数量。过去几年，我们曾经稍稍提高棉花的价格，来奖励棉花的增产；也曾稍稍提高猪的价格来奖励养猪，这些措施都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经验告诉我们，假使我们把某一种产品的价格定得太低，这一种产品就会减产，就会完不成国家的生产计划。

有些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各类产品的生产，都是由国家计划来调节的，国家在调节生产的时候不需要考虑价格政策。这样的认识显然是不对的。不错，在农业合作化以后，特别是在公社化以后，国家利用价格政策来调节生产的事实似乎愈来愈少了。但这并不是说价格政策已经不起作用，而是由于我们的价格经过几年来的调整，已经大体上合于比例，能够保证国家所要求的工业同农业之间，和各类农产品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实现。价值规律是“无所在、无所不在”的东西，当你没有违背它的时候，它似乎并不存在；如果违背了它，它就立刻出现了。可以设想，假使我们真的把一吨棉花的价格降低到同一吨粮食的价格相等，那会产生什么结果呢？结果一定是种棉花的合作社或公社大量亏本，因而不得不改种其他作物，否则就会因此破产。总之，棉花的产量就会大大减少，就会迫得国家不得不提高棉花的价格。



我们的社会产品种类繁多，数以千计，每一种产品还可能有许多种不同的规格和花色；我们现在只能把几百种重要产品列入国家计划。在工农业生产中，列入国家计划的主要是重要产品，这种产品种类很少（当然，列入计划的都是大量生产的产品，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还是很大的），有很多次要的工业品、农产品和土特产等不列入国家计划，国家主要通过加工订货合同等办法来进行调节。对于这一部分产品，价格政策就起比较大的作用。即使对于列入国家计划的产品，也必须规定适当的价格。各国营企业在完成了国家的生产计划以后，总愿意多生产获利比较多的产品，少生产亏本的产品，价格的高低对企业生产某些产品的积极性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当然，对于国营企业的生产，在规定了适当的价格以后，国家主要通过国民经济计划和订货合同等方式来进行调节；对于人民公社所生产的主要产品也是这样，滥用价格政策也是不适当的。

第二，利用价格政策来影响某些消费品的销售数量，通过流通过程来保持各类消费品供需之间的平衡。国家在出售消费品的时候，也可以利用价格政策，有计划地来扩大或缩小某几种消费品的销售数量。例如我们在白糖过多的时候，曾经减低糖价，使白糖的销售数量显著增加；在白糖不足的时候，也曾经适当地提高糖价，来限制销售数量。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利用提高烟酒价格的方法，来限制烟酒等产品

的销售数量；有些国家还用提高某些高级消费品的价格的办法，来限制这些高级消费品的销售数量。对于粮食（面包）和某些药品、书籍、文具等，则往往采取薄利广销的政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购买力虽然可以由国家计划来控制，但消费品的品种和花色，则让人民自由选择；因此，通过价格政策来影响各类消费品的销售数量，便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许多种消费品的供应常常满足不了需要。因此，不可能也不应该滥用提高价格的办法来限制这些消费品的销售数量。特别对于人民生活十分必需的消费品，更不能轻易提高价格，以免在实际上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种场合，就必须采取定量供应的办法，来限制销售数量，使这些消费品的分配达到公平合理。我国目前对粮食、食油和棉布等的定量供应制度，无疑地是完全必要的措施。如果不是这样，而采取提高价格的办法，则对收入多的人民所起的限制作用不大，而对收入少的人民则是相当沉重的负担，有可能因此而使他们不能满足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因此，利用价格政策来影响某些消费品的销售数量，也象利用价格政策来影响某些产品的生产数量一样，是可以利用的一种办法，但不应该滥用这种办法。

第三，利用价格政策来调整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水平，特别是调整工人同农民之间的消费基金的分配。消费品的价格，同



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在人民的货币收入不变的情况下，降低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就等于提高货币的购买力，从而就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国家在提高职工的生活水平的时候，通常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提高货币工资，另一种是降低消费品的零售价格。采取后一种办法，不但提高了职工的生活水平，同时也提高了农民等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也就相应地降低一些国家的积累。因此，消费品的零售价格，是调节国家积累和人民生活的极重要的杠杆。社会主义国家为着保证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来稳定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适当降低消费品的零售价格。但是，在降低消费品的零售价格的时候，除不使这些消费品因降价而脱销外，还应当保证国家的积累仍然能够不断增长，从而有可能不断地扩大建设规模，加速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社会主义国家在存在着两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条件下，农产品的采购价格，是调节工农生活水平的极重要的杠杆。农产

品采购价格的高低，对农业生产合作社或农村人民公社的收入有很大的影响，从而也影响到它们的社员——农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国家调整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办法：一种是调整农业税，另一种是调整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我国在过去几年，由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还很低，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显著地低于工人。国家为着调整工人同农民之间的生活水平，除适当控制职工的工资标准外，还有必要把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从原来的基础上稍稍提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就把各类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分别提高了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因而使农民除了从农业增产方面增加的收入外，还从价格方面多得了几十亿元收入，使农民生活得到了相当显著的改善。到将来农村人民公社逐步地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后，农民的生活水平将要不决定于公社收入的多少，而决定于国家统一的工资标准；那时通过农产品收购价格来调节农民生活的作用，也就要跟着消失了。

根据价值（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进行经济核算

社会主义国家为着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生产成本，必须进行严格的经济核算。马克思说：“簿记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比它对于手工业经营及自耕农经营的分散的生产，更为必要；它对于社会共同

的生产，又比它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资本论”第2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45页）我们的经济核算是要核算什么呢？首先是要核算生产中消耗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生产中的各种物质消耗），要



使各个企业按一定的价格出售其产品所得到的货币，能够充分补偿生产中支出的工资和各种物质消耗；此外，还能够取得一定数额的盈利来作为国家的积累。在这里，产品的价格和在生产中所消耗的原材料和燃料（这也是其他企业的产品）等的价格，就十分重要，是决定着核算结果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社会主义国家为着正确进行经济核算，在規定各种产品的价格的时候，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根据呢？这是政治经济学所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决定国营企业各种产品的价格的唯一可以采取的依据，就是价值，就是生产这件产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是不是可以采用别的依据来决定价格呢？不能。因为只有价值是各种产品共同的、可以互相比较的东西，而且我们经济核算的目的，也是为着节省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是不是可以把各个企业在生产这件产品的时候所消耗的个别的劳动量，而不把社会必要劳动量作为价格的依据呢？也不能。这样就不能奖励先进的企业，鞭策落后的企业；而且这样就会由于各企业的价格没有共同的标准，而使各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等无法互相比较；也就是说，无法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核算。社会主义国家为着使各企业在生产中消耗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得到补偿，必须基本上根据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规定各种产品的价格，各企业在互相交换其产品的时候，也必须基

本上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营企业，必须用基本上符合于社会必要劳动量的价格，来互相交换其产品。如果这些产品的价格，有的显著地高于它的价值，有的显著地低于它的价值，那末有一些企业就会得到额外的盈利，有一些企业就得不到应得的盈利，甚至还会亏本。如果根据这样的经济核算，来评定各生产部门和各企业经营的好坏，就会由于受不合理的价格的影响而作出错误的结论。某些产品的价格过高或过低，不但会影响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的经济核算，而且会影响使用这些产品的企业的经济核算。如果煤炭的价格定得过高或过低，则不但会影响全体煤炭工业的经济核算，而且会影响大量使用煤炭的冶金工业、电力工业等的经济核算。这种现象如果任其发展，将使整个国民经济的核算陷入混乱状态。

社会主义国家不但利用基本上符合于其价值的价格，来进行生产中的经济核算，而且利用同样的价格，来计算投资的效果，并根据它来考虑投资的方向。社会主义国家对各经济部门的投资分配（也就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配），是通过国家计划来实现的。但是，在决定究竟什么样的投资比例，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最有益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样地也必须通过价格来进行经济核算。比如，我们要决定多发展煤炭工业，还是多发展石油工业（如果资源没有问题），对国家更有利益，



就必须正确规定煤炭和石油的价格。如果这两者的价格，一个是显著地高于其价值，一个是显著地低于其价值，那末根据这样的价格所作出的经济核算，就一定是不正确的。如果据以决定国家的投资方向和投资的比例关系，就有可能使国民经济受到重大的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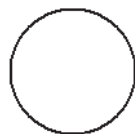
社会主义国家对某些非生活必需的消费品，有时需要采取高价政策，即以高于其价值的价格出卖给消费者；象烟酒就常常是高价出售的。在这场合，国家可以把价格高于其价值的部分，作为货物税或周转税另行征收，使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仍然只能得到一般的盈利。社会主义国家有时还需要用低于其价值的价格，把某些农业机械出卖给农业生产合作社或农村人民公社，这时国家可用正常的价格向工厂收购这些产品，然后低价出售，差额由国家来补贴。采取这些办法，使生产这些产品的工厂，仍然以大体上符合其价值的价格出售其产品，是很有利于国家的经济核算的。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核算，还必须以价值为根据，各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还必须遵守等价的原则。有些同志机械地根据国营企业同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所有者没有改变这个事实，来否定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利用商品、货币、价值等形式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重要意义；甚至认为，在这样的交换中，“等价交换的原则已经失去意义”。这样的认

识，无疑地对我们的经济工作是十分不利的。

社会主义国家国营企业的经济核算，是建立在按劳分配制度的基础上的。企业的产品的价值，如果除去物化劳动部分（生产中的物质消耗），就是职工所提供的活劳动。而所谓物化劳动，也是由其他许多企业的活劳动构成的。职工所提供的活劳动，大体上等于企业付给职工的工资和企业的上缴盈利（包括税款）。既然职工的工资大体上等于职工所提供的劳动的为自己的部分，而盈利则大体上等于他们所提供的劳动的为社会部分，那末，企业的生产成本（工资加物化劳动部分）加上上缴盈利，就应当同企业的产品的价值相等。因此这种经济核算，还是同按劳分配制度密切联系的；也就是说，同劳动者个人利益的计算密切联系的。到将来共产主义时代，情况就完全不同。劳动者的收入不决定于他们所提供的劳动的多少，而决定于需要。在企业的经济核算中，就没有工资这一个项目。这时企业在核算劳动消耗的时候，就同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丝毫不发生关系，纯粹是社会内部的核算了。从这个意义来讲，共产主义时代虽然同样也要进行经济核算，在企业同企业之间可能也要计价算账，但同物质鼓励已经脱离关系，因而它同社会主义时代的经济核算和等价交换，已经性质不同了。

以上对价格问题的研究，同时也说明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价值规律所起



作用的問題。列宁曾經指出：“价格是价值規律的表現。价值是价格的規律，即价格現象的概括表現。”（“列宁全集”第20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94頁）可見价格政策問題，也就是如何利用价值規律来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問題。价值規律是客观存在着的、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的东西；而价格政策則是主觀規定的、是人們对价值規律的具体运用。在社会主义社会，只要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存在，价值規律就一定要起作用，要它不起作用是不可

能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規律不是作为不受人們支配的自发力量而起作用的，在一般的情况下，价值規律的作用已被国家自觉地、有计划地利用；利用它来达到加速完成社会主义建設的目的。当然，国家在利用价值規律的时候，还必须遵守产品的价格必須大体上符合其价值的規律。如果我們严重地违反了价值規律，那末价值規律就仍然有可能违反人們的意志而自发地發揮它的作用。

农村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等价交换

我国农村在人民公社化以后，商品生产仍将繼續发展。在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自給性的生产还占优势。这种情况，并不表明我国的农业已經在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表明我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还很低，还没有完成从自給性生产到商品性生产的轉变。目前我国粮食的商品率只达到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这就是說，要用四分之三的人口来进行农业生产，才能保証全国的粮食供应。在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以后，劳动生产率就可以大大提高，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可以降到四分之一，甚至更少一点，粮食的商品率自然就要大大提高。在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以后，农业生产所消耗的机械、石油、电力、化学肥料等都会大大增加，其中絕大部分是不能由公社自己生产的，因而也有必要出售大量的粮食

和其他农产品，来換回这些生产資料。总之，生产的技术水平愈高，生产中需要互相交换的产品也愈多，愈需要較大范围内的分工协作。那种認為我国的农业生产可以朝着自給自足方向发展的想法，显然是违反社会經济发展的客观規律的。

在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以后，种粮食的农民可以大大减少，人民公社就可以抽出大量的劳动力来发展多种經營，发展工业生产，从而商品生产所占的比重又将繼續扩大。有些同志認為，农村人民公社执行了农林牧副漁、工农商学兵相結合的方針，就会朝着自給自足的方向发展。这是一种幻想。由于各个地区的生产条件不同，把人民公社发展成为一个自給自足的单位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經济上是不合算的。事实上，人民公社决不可能生



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产品，他們所需要的生产資料和消費品，大部分要靠国家和其他公社来供应。而他們所生产的产品，又大部分远远超过自己的需要，其中有一部分甚至可能是自己不需要的。当然，这并不是說农村人民公社可以不要努力发展自給性的生产；公社的自給性生产也要发展，应当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公社及其社員所需要的一切生产資料和消費品，凡是有条件自己生产，而且在經濟上又合算的，都应该尽可能自己生产。但因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經濟条件不同，在共同发展中仍需要有分工协作，互通有无。过分強調自給自足，不合于社会經濟发展的客观規律，对国家和公社都是不利的。

跟着生产的迅速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将逐步提高，农民生活資料中商品性的部分所占比重也将愈来愈大。現在我国农民的全部生活开支中，单单粮食一項就占一半上下，因此自給性的部分占着很大的比重。若干年后，跟着生产的飞跃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情况就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他們就会愈来愈多地需要现代工业所生产的多种多样的消費品。单单依靠公社所生产的一部分工业品，显然是不可能完全滿足它的社員的全部需要的。而且，随着公社工业的发展，在公社内部也必须发展商品交换，而不可能完全采取直接分配的办法。因此，不仅从生产方面來說，就是从消費方面來說，也有必要繼續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有些同志認為，农村人民公社現在已經采取了工资制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如果供給制的部分渐渐扩大，消費品的分配通过商品货币形式的部分就会渐渐縮小。这也是不合于实际情况的。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还很低，社会产品还不够丰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內，仍将基本上采取按劳分配的制度。即使在农村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后，只要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能够滿足全体人民一般的生活需要，就必须繼續保持按劳分配的制度。在今后若干年內，工资部分不但不会縮小，而且还要适当扩大。即使供給部分，也可能要采取商品货币的形式。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他們的生活需要就愈来愈复杂；为着滿足人民多种多样的需要，就必须利用商品货币的形式来进行分配。在按劳分配的条件下，采取商品货币的形式来进行消費品的分配，比较容易得到消費者的欢迎。

有些同志認為，我国的农村人民公社快要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在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后，公社的产品也归全民所有，因此就用不到发展商品生产了。实际上，农村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还需要一个过程。即使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公社的产品也同其他国营企业一样，仍然必須互相交换，仍然必須等价交换。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并不能改变产品中需要交换的部分繼續扩大的趋势。現在許多大規模的現



代化的国营企业，有哪一个是自給自足的經濟单位呢？在目前，国家同公社之間必須保持等价交換的原則，承認价值規律还起作用。就在公社內部，为着进行經濟核算，公社同各生产队和社营企业之間也有必要进行等价交換，各計盈亏。否則，就会使国家和公社的經濟核算陷于混乱，造成极大的浪費，甚至有可能損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除規定的农业稅外，不应当无偿調用公社的产品；公社一般也不应当无偿調用生产队和社营企业的产品，調用时都必須計价算賬。

总之，在农村人民公社普遍建立起来

以后，我們还有必要发展商品生产，繼續执行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換的原則，还有必要繼續遵守价值規律。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說：“应当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內，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間的商品交換，必須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繼續发展商品生产和繼續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則，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經濟是两个重大的原則問題。”过早地否認商品生产、商品交換、货币制度、价值規律等的作用，无疑是十分錯誤的。

对几种不同意見的商討

几年来，我国的經濟科学工作者和經濟工作者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規律問題，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見。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換方面，有些同志認為，只有两种所有制之間的交換才是商品交換；国家同消費者之間的交換已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交換；各国营企业相互之間的交換就已經不是商品交換，只保存商品的外壳了。有些同志認為，上述三种交換基本上都是商品交換，只有程度上的区别。因为上述三种交換，既然交換双方都还必须在不同的程度上計較各自的物質利益，因而都必须基本上遵守商品交換所通行的原則，即按照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进行等价交換，那就應該承認这些交換都还基本上保存着商品交

換的性質。

有些同志認為，对商品交換所作的后一种解釋是不科学的，不符合于許多經典著作中的說法。應該說明，我們討論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而不是私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更不是資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从資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逐步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換在数量上仍将繼續增长，但这时候，在質量上則正从商品过渡到非商品，商品所包含的內容正在逐步消失。如果一定要內容十分完整才算商品，那末連两种所有制之間的交換也不能算是商品交換。如果有商品的內容就承認它，有几分就承認几分，那末前面所說的



三种交换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商品交换的性质。一方面承认它们的共同性，另一方面又指出它们的差别性。指出这三种交换不但与私有制度下的商品交换根本不同，而且三种交换方式的本身，也各自存在着不同的性质，应当区别对待。我认为，采取这样的研究方法，比较容易解决实际问题。

在价值规律所起的作用方面，有些同志认为，所谓价值规律还起作用，是指它对产品的生产或销售还起调节作用。因此对国营工业所生产的列入计划的产品，价值规律已经不起作用；对人民公社所生产的列入计划的产品，价值规律也只起很小的作用；只有对不列入计划的产品，价值规律才起比较大的作用。有些同志认为，只要产品还必须按照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进行等价交换，就证明价值规律还起作用；因此即使对国营工业列入计划的产品，价值规律也起作用，因为它仍然必须遵守按照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进行等价交换的原则。

我认为，上面所说的价值规律的两种作用，实际上只是一种作用的两个方面。价值规律要求各种产品的价格，都必须以它的价值，即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为基础。^①这是价值规律所起作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某种产品的价格高于或低于它的价值，那就会影响它的生产数量或销售数量（反过来，如果产销不平衡，也有可能影响产品的价格）；也就是说，

价值规律对这种产品的生产或销售（或价格）起调节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的前一种作用，必须受到普遍的重视，即使国营工业列入计划的产品也不能例外（至多只有程度上的差别）。价值规律的后一种作用，只有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已经受到国家计划的严格的限制。但这并不是说价值规律已经不起作用；它还是在起作用，在冲击着我们的国家计划。如果价格和价值背离过大，它的冲击力量仍有可能影响生产和销售数量，甚至有可能破坏国家计划，破坏供需间的平衡。特别对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和不列入计划的产品，价值规律的冲击力量所发生的破坏作用就更大。这时国家仍有必要用调整价格的办法，来保证国家计划的实现和供需间的平衡。

价值规律是客观规律。既然是客观规律，它就不能由人们的意志来改变。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图，有意识地运用客观规律，是完全可能的，但必须以遵守客观规律为条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有可能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而不使其自发地调节生产，发生破坏作用。但从可能变为现实，还必须认识它、掌握它。假使你违反了客

^①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所作价值规律的定义是：“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按照这一规律，商品的生产 and 交换是以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为基础的。”1959年人民出版社，第59页。



观规律，它就仍然要自发地起作用。天空中的闪电是自发地起作用的，电灯里的电就是听从人的指挥发生作用的。但如果你违反了电的自然规律，就是已被掌握的电，仍然会违反人的意志，烧死人，烧掉房子。价值规律也是如此。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能够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使价值规律听从我们的指挥，这是我们主动地遵守了价值规律的结果；而不是说我们可以任意违反价值规律，也不是说价值规律已经不再发生作用。

当然，我们也不赞成对价值规律的作用作过高的估计。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上，如果认为上述三种交换都是完整的商品交换，没有必要加以区别，也是不妥当的。在三种交换中，只有第一种交换（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交换）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商品交换，第二种、特别是第三种交换已经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商品交换了，但仍然基本上或部分地保存着商品交换的性质。就连第一种商品交换，也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而是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了。由于三种商品交换性质上有差别，所以虽然都要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但其目的不同。在第一种场合，等价交换是为鼓励集体所有制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在第二种场合，是为正确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第三种场合，是为保证生产中消耗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能够得到补偿。这三者是显然不同的。

在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上，如果无限制地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调节消费品的销售，而否认国家计划的作用，象现代修正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各种重要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必须用国家计划来调节；当然国家在调节生产和流通的时候，仍然必须掌握正确的价格政策。对各种次要的产品，如果不可能通过国家计划来调节，也可以由国营商业机关通过供销关系来进行调节，即通过国营商业机关的供销计划，通过国营商业机关同各生产单位所订立的加工订货合同，通过某些消费品的定量供应制度，在必要时并以调整价格作为辅助的手段。国家既不当不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任意违反等价交换的原则；也不应当滥用价值规律来调节各种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更不当抛弃了国家计划而依靠价值规律来进行调节。

在目前，我国的经济科学工作者对于商品和价值规律等范畴，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其中有些争论仅仅是概念的争论，而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我认为，单纯概念的争论是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为着避免卷入概念的争论，我把问题的实质——例如几种不同性质的交换，价格政策的几种具体运用等——提出来，并提出我自己的看法。至于如何用商品和价值规律等范畴来说明这些问题，我说得很不完全，而且也不一定能够令人信服，这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讨论。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 翦伯赞 ★

一 古与今的问题

在过去的历史教学中，许多人过分强调古代史的重要性，甚至对古代史发生迷信，认为这是一个史学家必须通过的炼狱，至于近代现代史则不值一顾。一直到整风运动以前，还有一些史学家“禹行而舜趋”，“呼先王以欺愚者”。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是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学的特点。我们反对了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并且针对这种情形，提出了厚今薄古的方针，这是必要的。

厚今薄古的方针提出以后，在全国各高等学校的历史系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讨论中揭发出来的厚古薄今的倾向是十分严重的。有些高等学校在七门中国史必修课中有五门是古代史。在十一门选修课和加修课中，只有两门是近代现代史。面对这样的事实，大家都认为厚今薄古方针的提出是及时的，必要的。但是对于厚今薄古这个方针的理解还是有些问题。

照我个人的看法，古今厚薄问题不是什么别的问题，它是史学家对待现实问题

的态度在历史学上的反映，是隐藏在历史学中的史学家的政治倾向性和阶级意识的表现形式，而古今厚薄的分歧则是历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然而现在有不少的人把厚今薄古当作分量问题或先后问题。

有些高等学校过多地削减古代史在通史中的比重，个别学校削减到百分之三十。古代史在通史中的最大比例是百分之四十五，没有达到百分之五十的。中学的情况也是一样。有些省市新编的初中历史课本，把一年讲完的古代史，压缩在一学期讲完。小学也有类似的情况。这种种情况说明了有些人把厚今薄古理解为压缩古代史的分量问题。

我以为把厚今薄古理解为分量问题是不对的。就历史学方面来说，厚今薄古只是说要以更多的力量，更大的注意来加强近代现代史的研究，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好好地研究古代史。它并没有反对古代史本身的意思，它所反对的只是过分强调古代史和为古而古、颂古非今的那种资产阶级



級历史学的傾向。这是一个思想問題，不是多少的問題。

只要历史学家从自己的头脑中清除了資产階級反动的历史观点，建立无产階級的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抱着古为今用的目的去研究古代或传授古代史，这并不算厚古薄今。反之，如果思想問題沒有解决，口里講近代現代，心里想的是古代，厚今薄古的問題还是没有解决。

應該着重講授近代現代史，这不仅因为近代現代史具有比古代史更丰富更复杂的内容，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古代史，更重要的是近代現代史是我們当前的历史和接近我們当前的历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但是历史是一种貫通古今的學問，为了更深入地闡明近代現代史，必須在通史中給古代史以适当的篇幅，讓学生能够知道我們的历史是通过了一些怎样迂迴曲折的进程走到現在的。

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如埃及、印度，都沒有象中国这样保存了将近三千年的完整的編年史和历史人物傳記。我們既然保存了世界稀有的完整的古代編年史，为什么不进行認真的科学研究呢？只要我們方向正确，进行認真的科学研究，可以断言，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将作出一定的貢獻。

中国的古代史，并不是研究得太好，而是太差。一般地說来，中国历史的研究，只有殷周史和近代史作过一些馬克思主义

的專門研究。自殷周以后至鴉片战争以前，这两千多年的历史，还需要大大地努力进行深入的專門的研究，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辯証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写出一些断代的专史，如秦汉史、魏晉南北朝史等等。然后在这些专史的基础上进行綜合的研究，写出中国原始社会史、奴隶社会史和封建社会史。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綜合研究，才能写出一部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中国通史。当然除此以外，还有很多专史，如土地制度史、手工业发展史、商业交通史、城市发展史、法制史、文化思想和艺术史，特别是农民战争史和各少数民族的历史等等，都要写出专史来。不完成这些古代史的研究工作，就想大笔一揮在中国历史上划出一条階級斗争和生产发展的紅綫，那是办不到的。

当然这不是說，我們在历史教学中就不應該貫徹略古詳今的精神。略古詳今是應該的，問題就是詳略的程度，要有个限度。这个限度的大小，可以規定一个大概的比例，但不應該任意規定，而應該决定于历史的内容。古代史可以从略，但應該略其所当略，不能因为要符合于比例而略去不应略去的部分，略得太多就会使学生在古代史方面得不到基本的甚至是起碼的知識。在另一方面，近代和現代史可以詳細一些，也應該詳其所当詳，不應該为了湊足比例而把不必要的史实硬塞进去，如果过分的繁蕪就会把学生引进鬧市，其結果是使人目迷五色，无所适从。



贯彻略古详今的方法也值得研究。合理的办法是逐步加详。例如中国猿人可以少讲一点，殷周就要详一点，秦汉又要比殷周详一点。这样从古到今，从略到详。当然这不是说后一时期必须比前一时期详细一些，假如后一时期没有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可以比前一时期简略一些。但一般说来，历史的内容总是愈到后来愈复杂，因而逐步加详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现在不是逐步加详，而是突然加详。好象鸦片战争的前一天都不重要，可以从略，鸦片战争一开炮，历史就重要了，就要加详。因而鸦片战争的前几年，可以用几百字交代，一到鸦片战争的那年，就是洋洋数万言。这种突然加详，直捷上升的办法，是不妥当的。关于这一点，应当向司马迁学习。司马迁写史记，就是用逐步加详的办法来贯彻略古详今的精神。他写五帝则共为一个本纪，写夏、殷、周则各为一个本纪，写到了秦汉，则每一个帝王一个本纪。作表也是一样，对三代只作世表，对六国、汉兴以来诸侯王、功臣以及将相名臣，则作年表，对楚汉之际则作月表。

另一种情况是把厚今薄古当作先后问题，即用先后来表示厚薄。有些高等学校，先教现代史，再教近代史，最后才教古代史。这种先今后古的办法，对于那些具备了通史知识的历史研究工作者是可以采取的，因为他们可以从近代现代史找到打开古代史大门的钥匙；但是如果采取这样的办法讲授通史，却是值得研究的。因

为通史的目的，是要使学生得到一种贯通古今的基本历史概念，它不仅要阐明每一历史阶段自己发展的过程，及其所独有的历史特征，而且要阐明从一个历史阶段过渡到另一历史阶段的变革过程，例如讲述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或者讲述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必须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才能阐明。因为“所谓历史发展，最后的形态总是把过去的形态看成是向自己发展的步骤”^①，前一历史阶段中孕育着后一历史阶段的因素，在后一历史阶段中残存着前一历史阶段的断片，不了解前一历史阶段，对于后一历史阶段就无法说明。

在讲授历史的时候，贯彻古为今用的精神是对的，但如果把古为今用理解为古今类比，那是错误的。例如把古代农村公社和我们现在的人民公社类比，又如把明代在朝鲜进行的抗击倭寇的战争和解放后的抗美援朝类比，这都是不对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历史事件，必然具有不同的内容与性质，我们不应该因为某些表面的类似就抹煞它们本质上的差异，而把古人古事拉扯到现在。古为今用，不是历史类比，而是要求教师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方法总结历史上各种有用的经验，如生产劳动的经验、阶级斗争的经验以及抵抗外来侵略保卫祖国的斗争的经验，用这些经验来进行生产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8页。



劳动的教育、阶级斗争的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

总而言之，厚今薄古的问题，既不能用过多地压缩古代史的办法来求得解决，也不能用先今后古的办法求得解决。思想问题，必须从思想上解决，即必须在广大的历史学工作者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不这样做，就不能从

思想上解决厚今薄古的问题。列宁说过：“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①列宁的这几句话，对历史学也是适用的。为了从思想上解决厚今薄古的问题，必须做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自觉的信徒。

二 历史的必然性与个别历史人物的问题

过去在历史教学中，过多地或者不恰当地强调了个别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对于人民群众的作用讲得不够，对于经济和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讲得更不够。这种现象，已经受到批判。但在目前历史教学中又出现了一种避免提到个别历史人物的现象。有些教师把商鞅变法改为秦国变法。凡是讲到汉高祖的地方，都用“汉初”二字代替他的名字。讲林则徐焚毁鸦片，也认为可以不提林则徐的名字。甚至讲儒家学说，有人不提孔子。在世界史讲授中也有这样的现象，个别的教师把亚历山大东征改为马其顿东征，把革拉哥兄弟的改革，改为农民为保持土地而斗争。理由都是一样，即认为上述历史事件和学术思想，都是历史的必然性或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所引出的结果，和个别历史人物没有任何关系。

着重说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对的，因为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要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过程揭示它的客观规律性，或整

个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通过无数偶然事件实现出来的，“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历史就会具有非常神秘的性质。”^②

马克思说，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偶然’情况，其中也包括有象起初领导运动的人们的性格那样的‘偶然’情况。”^③列宁也说过，“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④因此，全部否定个人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而把经济规律性或历史必然性绝对化、偶像化，这是错误的。如果把任何历史事件都说成

①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全集”第33卷，1957年人民出版社，第204页。

②③ 马克思：“致密·库格曼”，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65页。

④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1卷，1955年人民出版社，第139页。



是和个别历史人物的活动没有任何关系，而简单地归结为历史必然性的结果，或者用历史必然性解释一切历史问题，那就正象恩格斯所说的：“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演算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为容易了。”^①

过分地强调个别历史人物的作用，以至把他们说成是不受历史规律的支配，不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可以为所欲为，这是唯心主义者的胡说。但是如果不承认个别历史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一定作用，乃至避免提到个别历史人物的名字，也是一种严重的片面性。全面地讲述历史，应该是在肯定历史必然性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原则下，承认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一定作用。因此在讲述历史时，就不必避免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的名字，包括帝王将相在内。

避免讲孔子，不过因为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黑格尔也是一个大唯心主义者，马克思却公然承认他是这个大思想家的门人。避免讲汉高祖，不过因为他是一个帝王；拿破仑也是一个帝王，恩格斯却认为他是被战争弄得疲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不讲商鞅，不过因为他是一个将相；俾斯麦也是将相，而恩格斯却恰如其分地肯定了这位有丰富的、实际的阅历而又非常狡猾的人物，实行了和普鲁士希望一致的民族统一。林肯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解放黑奴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但是马克思却说“他是具有伟大成就而又心地善良的出类

拔萃的人物之一”^②。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保皇党，但因为他违反了自己的阶级同情，以毫不掩饰的赞赏去述说他的政治死敌——圣马利修道院街的共和主义英雄们，而恩格斯就称赞他是“比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③。

历史人物是可以讲的，因为遮蔽人们的眼睛，让人们看不见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不是历史人物本身，而是历史学家过分重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那种资产阶级思想。如果不清除这种思想，即使不讲个别历史人物，也不一定就能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因此问题不在于讲不讲个别历史人物，而在于如何讲法。假如我们从阶级观点出发来讲述个别历史人物，那就正象马克思所说的，他们“都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负担者。”^④用这样的观点讲述历史人物，则不但不会妨碍阐明历史规律，而且还可以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反映出他们生存时代的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若

①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89页。

② “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信”，《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83页。

③ 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20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初版序第5页。



于情况，有助于历史规律性的阐明。只要我们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对待古人，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人物是可以讲和应该讲的。领导农民去轟击封建统治阶级的农民革命领袖，和英勇地保卫祖国的独立，击退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们固然应该讲，对于那些在历史上作出出色的贡献，并且因为他们的贡献而加速了我国历史的进程的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也应该讲。就是帝王将相也不应一概抹煞，秦始皇、汉武帝固然要讲，就是李后主、宋徽宗，也不能从文学艺术史上抹去他们的名字。妇女也不要除外。我国历史上有很多杰出的妇女，例如缙成“汉书”的班昭，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的完成者；宋代的女词人李清照，也应该被认为是文学史上的一颗珍珠。此外，如象王昭君、烏孙公主、文成公主等，也不能抹煞她们在汉唐时代的民族友好关系上所起的一定的作用。

坏人也要讲，因为他们曾经起过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

总之，在讲授历史的时候，应该着重地讲述历史上各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和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也要讲个别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一定作用。

和历史学恰恰相反，过去的考古学只是讲古物的形制花纹等等，从这些方面来相互比较，确定古物的年代，因此在考古学的教学中，主要的是讲器物排队，学生所接触的是石器铜器陶罐等等，从来看不见人。

研究古器物的形制是重要的，但不论怎样重要，也只是考古学的手段，不是目的。考古学的目的是要通过古器物来说明这些器物制作者和所有者的生存时代的社会关系，亦即要发现隐藏在這些古器物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最后发现阶级与阶级的关系。

从古器物中去寻找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是困难的。例如我们曾经发现古代的谷物，其中有小麦，但正象马克思所说的：“小麦的滋味不能告诉你，它是谁栽种的；同样我们研究这个过程的时候，也不能看见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奴隶管理人的残酷的鞭下么？在资本家的注意的眼下么？是象辛辛拿达在他的小田园内生产一样么？是象野蛮人用石头击杀野兽一样么？”^①

和小麦一样，其他出土的古器物，都不能告诉我们上面所说的情况，然而我们的目的却是要知道上面所说的情况。这种情况是可以找出来的。考古学家如果注意那些和罐罐罐罐一同出土的生产工具，就有可能发现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因为这些生产工具都表现着社会生产力的一定水平，用马克思的话说，它们“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程度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所在的社会关系的指示物。”^②

现在考古学的讲授又有些相反的情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00页。

② 同上书，第195页。



况，好象考古学要离开物的研究来讲人与人的关系，这也是不对的。因为考古学上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与物结合着作为物而出

现的，换言之，是物化了的人与人的关系。考古学应当努力要通过古器物找到人与人的关系。

三 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问题

旧的历史学，都贯彻着以帝王为中心的正统主义历史观，因而它的内容主要地是写统治阶级方面的活动。如果也提到人民群众，那是被当作历史上的消极的、被动的因素。

解放以来，许多历史教师已经承认了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历史观，但由于传统的影响，个别的教师有时还是过多地不适当地讲述统治阶级的活动。例如有一位教师把朱元璋说成人民的皇帝，因而使学生对朱元璋发生了衷心的崇拜，大作“洪武颂”。有些教师对宫廷生活很感兴趣，在讲述安史之乱的时候，不着重分析这个变乱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和它所引起的后果，却大讲唐玄宗的宫廷生活，引导学生去欣赏霓裳羽衣之曲。这种讲法当然是不对的。

为了清除封建正统主义历史观，现在也有个别的教师避免讲述统治阶级的活动，乃至避免提到他们的名字。例如个别的教师讲秦始皇筑长城、汉武帝治黄河、隋炀帝修运河的时候，既不提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的名字，甚至也不讲秦王朝、汉王朝、隋王朝，而用几十万或几百万劳动人民代替这些皇帝的名字和王朝。我以为这样的讲法也是不妥当的。诚然，筑长城、治黄河、开运河都是当时的劳动

人民的劳动。秦始皇没有挑土，汉武帝没有筑堤，隋炀帝没有挖河，但是他们却是这些巨大工程的发动者、组织者，不承认他们动员和组织工作的作用是不对的。马克思在说到亚洲各国巨大建筑和公共工程时曾经引用了这样一段话：“那种种令人惊异不置的遗迹所以能够发生，就因为该帝国的君主和教主，对于这大群人有指挥的权力。”^① 中国没有教主，具有指挥权力的就是君主，而君主之所以具有指挥的权力，就是因为他们在封建地主制度的基础上掌握了劳动人民赖以生活的资料。

不仅公共工程如此。在以往的阶级社会中，劳动人民从事任何劳动生产，都必须以各种被奴役被剥削的身分参加到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去，在他们的对面是各种各样的剥削阶级。这些剥削阶级掌握着当时的社会经济命脉、政治权力，强制劳动人民按照他们的意图去实现那些对于他们来说是必要的劳动创造。因此在讲到阶级社会的劳动生产时，就不能不讲到当时统治阶级的意图以及为了实现他们的意图而作出的具体措施。不讲这些，就不能说明劳动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06页。



人民是在怎样的关系之下来参加劳动生产的，亦即不能说明劳动生产中的剥削和被剥削、强制和被强制的情况，而这种情况是阶级斗争的最基本的原因。

在讲述封建社会的历史时，也有人认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包括政治经济的改革，例如王莽改制都可以不讲。我以为这是不妥当的。王莽改制是为了缓和正在兴起的农民革命斗争，实质上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自救运动，但是他的王田、奴婢、五均、六筭政策，却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些主要问题，由于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才爆发了赤眉、铜马、新市、平林的农民起义。不讲王莽改制，就不能说明西汉末年农民起义的历史背景。

还有人认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如汉朝的七国之变，晋朝的八王之乱也可以不讲，因为这些变乱，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我以为这也是不妥当的。西汉的七国之变，西晋的八王之乱，虽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但它们都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当时历史的主要内容的一个方面，怎么能不讲呢？不但七国之变、八王之乱要讲，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党派倾轧、宫廷政变也要讲。因为这些事变往往不是统治者个人的格斗，而是反映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害冲突，这种冲突直接间接影响当时人民的生活，甚至引发敌对阶级间或民族之间的矛盾，例如八王之乱引起了西晋末年普遍发生的流人暴动，同时，替“五胡十六国”的局面铺平

了道路。

在文化思想领域内的进步和落后、反动，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贯通古今的。在阶级社会中，这种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深刻最原则性的表现形式。它不仅被动地反映阶级意识，并且往往被用于阶级斗争的武器。既然是斗争，就不能只讲斗争的一个方面，也要讲斗争的另一个方面，比如说不能只讲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也要讲唯心主义的思想家。

由于统治阶级统治了物质生产资料和人，因而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在每一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的居于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它同时也就是该社会的居于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拥有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拥有精神生产资料，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要听命于这个阶级。”^①由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而凡是和这种正统思想对立的思想都被指为异端。当我们讲述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化思想的时候，要讲述这种被指为异端的思想，也要讲述统治阶级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阐明思想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转引自康士坦丁诺夫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98页。



总之，阶级社会的历史总是有敌对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统治阶级的活动，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活动，阶级社会就由这敌对的两个阶级构成了阶级斗争的两个方面，去掉了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全面地说明阶级斗争的内容。因此，在我们讲授历史的时候，固然要着重讲述人民群众的历史，但为了更好地说明人民群众的历史，就必须无情地揭露人民群众的敌人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用不同的形式剥削压迫人民的史实，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阶级斗争的全部内容，才能显示出人民群众的每一步前进都是残酷斗争的果实。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阶级社会的历史写

成漆黑一团，任何黑暗的时代总有一线光明。恩格斯曾经批评过旧唯物主义者把中世纪的历史当作历史行程中由千年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中断，而忽视中世纪所作的巨大成就，是“没有对事物的历史观点”。毛泽东同志也指出“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这些发明都是生长在阶级社会中的发明家所作出的巨大的贡献。因此，当我们讲阶级社会的历史时，要指出它的黑暗面，也要指出它的光明面。

四 理论与资料问题

过去在历史教学中，有一种过分强调史料的倾向，有些教师把占有史料当作历史学的终极目的，而以拾遗补缺作为历史学的主要任务，甚至认为史料就是史学。由于过分强调史料，有些教师在讲稿中大量堆积史料，而没有进行应有的理论分析。科学研究也是侧重繁瑛考据。往往为了一些不关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或问题的考证而搜罗摘抉，穷幽极微。例如有一位教师就考证过帽子和雨伞。对于重大的历史问题，反而轻描淡写，不予重视。象这样的史学家就正象章实斋所说的：“幸而后世也；如生秦火未燬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①

我们反对了把史料当作史学的说法，

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过史料本身。现在有个别教师对史料不够重视。他们为了避免陷于繁瑛主义，在讲授历史的时候，不根据具体的史实分析历史问题，只是空空洞洞地讲一些原理原则，或者干巴巴地讲一些发展规律，一再重复人所共知的道理。有些教师虽然也选择了一些史料，但并不是用原理原则来分析史料，而是把史料当作事例来注释原理原则。在历史研究中，没有任何事情比玩弄个别事例更容易的，然而这是毫无意义的。史料如果不被放在它的整体中，放在联系中，那它们就是一些孤立的历史碎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中）”篇。



片，任何問題也不能說明。

有些青年，也有輕視史料的情況，他們只滿足于一般的理論原則，而不去鑽研具體的歷史資料。但是恩格斯却反對這樣做，他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曾經批評過當時的德國青年作家。他說：“一般說來，對於德國許多青年作家，‘唯物主義的’這個形容詞不過是一個套語，他們用這個套語去處理各種事物，再也不花什麼氣力去作進一步研究，也就是說，他們一把這個標籤貼上去，就以為一切都解決了。然而，我們的歷史觀首先是個進行研究工作的指南，而不是一種用以按黑格爾學派方式構造體系的手段。全部歷史都應該開始重新研究。……這領域極為廣大，誰肯認真地工作，誰就能有很多的創造、獲得卓越的成績。”^①

不重視史料，或者企圖不通過史料的分析來說明歷史，是不對的。研究歷史必須從實在的具體的史實出發，不能從空話出發。孔子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的這句話是對的。

馬克思主義者從來不反對史料，而且十分重視史料。馬克思不止一次告訴我們，研究必須搜集豐富的資料，不占有資料，分析資料，便不能對於現實的運動作出適當的說明。他曾經嘲笑那些輕視資料的人，說他們“認為知識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自然不需要這種努力。他們這些幸運兒為什麼要為一些經濟學的和歷史的材料自尋

苦惱呢！”^②恩格斯也曾經說過：“即令只要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揮唯物主義觀點，也是一種需要多年靜心研究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裡講空話是無濟於事的，這樣的任務只有依靠大量的、經過批判審查了的、完全領會了的歷史材料才可解決。”^③毛澤東同志也曾經教導我們要我們在研究問題的時候“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

問題不在於史料本身，而是在於用什麼觀點和方法來對待史料。如果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來運用史料，則史料愈豐富愈好，史料愈豐富，得出的結論就愈益正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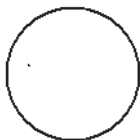
史料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理論。不用正確的理論來分析研究，史料等於廢物。因為歷史學的研究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一樣，“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反應劑。那必須用抽象力代替二者。”^④要具有這種抽象力，即理論分析的能力，就必須學習理論，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現在我國歷史學教師都在學習

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第487頁。

② 馬克思：“給魏德邁爾的信”，“馬克思恩格斯給美國人的信”，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5頁。

③ 恩格斯論卡爾·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4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7頁。

④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初版序第2頁。



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澤东思想，但是我們还是学得非常不够，这主要地表现在我們还没有学会怎样应用理論去分析具体历史問題，因而在講授历史的时候，理論与資料不能很好地結合，不能把理論貫串在史料之中。只要碰到具体的历史問題，理論和史料就分了家，史料归史料，理論归理論，分道揚鑣，各不相关。因此对于历史学教师來說，目前最主要的問題是加强理論的学习。要学好理論，当然要系統地学习馬克思主义，并且通过史料的分析，練習理論的运用。更好的办法是通过百家爭鳴的办法提出一些具体的历史問題、事件或人物展开爭論，只有在学术的論爭中，才特別感到理論的重要，也特別感到資料和理論相結合的重要。

理論总是帶有普遍性、一般性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沒有替中国史上的每一个具体問題、事件或人物准备現成的結論，

就是毛澤东同志也只是教导我們怎样研究历史。因此要想对于中国史上的每一个具体的历史問題、事件或人物都能找到現成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結論，那是沒有的。要解决这个問題，只有認真地学习毛澤东同志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对于历史学上的一些問題、事件或人物作出創造性的概括或判断。

馮援为孟尝君收債，問孟尝君說：“債毕收，以何市而反？”孟尝君說：“視吾家所寡有者。”我們的史学家，最好也检查一下，自己缺少什么，是理論、还是史料，然后补充自己所缺少的东西。我以为，对于許多人來說，最“寡有者”还是理論。因此，我們全国的历史学教师都应该努力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澤东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历史教学的水平。

編 者 的 話

薛暮桥同志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規律”和葛伯贊同志的“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問題”两篇文章，分別談到了目前經濟学界和历史学界所討論的一些重要問題，我們发表出来，供大家討論。



为了追求真理

· 施东向 ·

在科学研究的进程中，对于同一个问题发生了不同的看法和争论，这是常有的事情。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客观真理。追求真理的道路，从来不可能是平坦的；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从来不可能是轻而易举的。

前人在科学研究中所达到的正确的结论，当然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但是我们的任务不是重复前人的结论，而是要在前人所未有或不可能接触到的领域内，在前人所未有做出正确的或完全正确的结论的问题上求得真理。在进行这样的工作的时候，前人提出的正确的结论可以对我们起引导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少犯一些错误，少走一些弯路，而重要的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做艰苦的努力。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则，是我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所必须依靠的指南针；依靠这个指南针，我们就可以不犯大的方向错误，而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真理。但是有了这个指南针，并不能使我们在还没有解决的科学问题上不费吹灰之力而达到正确的结论。因此，就是人们确实依靠马克思主义为指南而向前探索真理，也会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

要在任何科学问题上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就必须详尽地掌握有关的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在越是复杂的问题上，就越是需要穷年累月的努力，才可能有真正的成就。但是经过努力而仍然得出错误的或部分错误的结论的情形也是可能的。

对于学术问题上的错误，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要分辨两种性质的错误。有一种人并没有花过收集材料、认真研究功夫，只是从感想出发，随便说出些错误的意见。这种错误，应该说并不是在科学研究中的错误，而是根本不进行科学研究的错误，这种错误除了证明人们不应当这样做以外，没有任何意义。另一种人是认真做了研究工作，但是因为方法不对头，掌握材料不完备或其他原因而作出了不正确的、不全面的结论。这种错误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往往是在达到真理的过程中所难免要经过的过程。科学史证明，在科学问题上提出正确的结论的人固然是有功劳的，而那些勇于在新的科学问题上进行试探，提出终于被修正甚至被推翻了的假设的人，也是有一定的功劳的。各种假设，各种不成熟的见解，各种带有片面性的主张的相互争辩，这对于达到正确的全面的结论，往往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所以，我们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要坚持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础上的百家争鸣。



毛泽东同志说：“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我们的共同目的是追求真理，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学术问题上展开充分自由的讨论。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是尊重你的发言权，这是在我們的学术讨论中所应当有的态度。当然，为了辨清是非，尖锐的批评有时是必要的；但是人们都应当采取说理的态度，努力用科学的论证来说明是非。

参加学术讨论的人，都应当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我们的社会，是真理能够开花结果的社会。但是有人却会因为自己的意见不被多数人赞同而动摇。如果自己的意见确是有错误，以至不被人赞同，那就应当修正自己的意见。但如果是正确的意见，即使只有少数人，甚至一二人同意，也应当坚持。在学术讨论中，真理有时并不在多数人的手里，而在少数人的手里。当然，只要的确是真理，那么少数人的意见也一定会慢慢地变成多数人的意见。

我们在有勇气坚持真理的同时，又必须有虚怀若谷的态度，要能够向一切人，包括向自己的争论对手学习，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修正自己的错误。缺乏坚持真理的勇气的人就会随波逐流，没有主张。不虚心听取别人意见的人就会自以为是，坚持错误。这两种态度都是应当反对的。科学本身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它要求人们以

老实的态度对待它。讨论的双方既然都是为了探求真理，发展科学，那么把对手那里正确的见解接受过来纠正或补充自己的见解，又有什么不好呢？

学术讨论，是长期或短期研究成果的展览和比赛。有些讨论，半途搁浅，无法深入，这种情形正是反映了在所讨论的问题上，大家还缺乏比较深入的研究。比较复杂的艰难的问题也往往不是一次讨论所能完全解决的。经过一次讨论以后，虽然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问题的症结可能暴露出来，我们自己之所以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弱点也可能暴露出来。这都是很有好处的。这就会促使我们更好地、更有目的地进行研究工作，努力去收集我们所必须具备的资料，去掌握我们所还缺乏的知识，去解决阻挠我们前进的疑难。这样，我们就能使讨论一步步深入，使科学研究工作的水平一步步提高。浅尝即止，对于科学事业是永远不会有好处的。

学术工作者应当勇于参加热烈的争论，也要甘于“寂寞地”进行切切实实的研究工作。不然，就容易形成“赶浪头”的现象。有一个寓言里说：有个木偶，听说海里有数不尽的珍宝奇葩，宛若仙境，于是便为自己安排了一次旅行。但当它在海面上飘浮很长的时间以后，却大失所望，因为他所看到的大海，除了一片汪洋以外，一无所有。我们最好不要做这个木偶，要获得“宝藏”，就得在真理的海洋里深入下去！



关于水电和火电問題的討論

李 銳

多发展水电还是多发展火电？这是长久以来頗有爭論的一个問題。

水电和火电是各有利弊的，在电力生产上是相輔相成的。一般說来，火电的特点是：造价低；建設時間短，又便于扩建；易于靠近用戶；年利用小时高；但是消耗煤炭多，運轉人員多，成本高；本身是个大用戶，即厂用电約占全部发电量的百分之七到八；運轉时起动慢，較易发生事故；設備制造耗用鋼材多，需要很多優質合金鋼；配套很复杂；基本建設用的鋼材也比較多。水电正大体相反：造价高；建設時間长；不能隨便靠近用戶；年利用小时比較低；枯水时电量要減少；但是成本低，只及火电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運轉人員也只有火电的十分之一；本身用电只占全部发电量的百分之一；運轉时起动灵活，很少发生事故；設備制造用的鋼材少，基本上不需要優質鋼材，有些部件还可用鑄鐵代鋼，配套也簡單得多；基本建設用的鋼材也比較少。

十年以来，我国电力工业的建設一直

是以火电为主、水电为輔的，水电的投資只占电力投資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現在火电占我国电力的四分之三以上，而且为了适应緊迫的用电需要，当前的电力建設仍然必須以火电为主。在今后两三年內，这一形势大体上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十年来形成火主水輔的根本原因，乃是用电急迫，而每年投資有限，必須將資金用于收效快的火电。但是，我国水电的发展，必然要随着国民經济的发展而发展。一方面，我国国民經济愈发展，愈需要大量的电力，大量的水电。另一方面，国家經济愈发展，也就愈有力量办水电；同时，我国丰富的水力資源是大量发展水电的有利条件。因此从长远說来，实行水电为主、火电为輔的方針，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是需要和可能的，当然，这个方針不是短期內能够实现的。

通过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水电建設的实际情况，对于我国水力資源特別优越的条件，大家有了更明确的認識；同时，水利工程必須和水电緊密結合，耗电工业的



发展有賴于水电的发展，水电設备国内便于制造，这几个方面的情况也越来越清楚了。

現在將四个方面的具体情况分別說明如下：

首先，最主要之点是：我国水力資源极其丰富，开发条件特別优越，利于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水电。

动力資源的条件，是影响世界各国水电和火电比重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現在世界的总发电量中，水电約占三分之一。以水电为主的国家是不不少的。挪威、瑞典、瑞士、加拿大、朝鲜、新西兰、日本、意大利、奥地利等国，水电占到全部电力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有的国家甚至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些国家水电之所以占了絕對优势，就是由于一方面水力資源比較丰富；另一方面又十分缺乏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动力資源。这些国家最好利用的水力資源，已經大部分得到了开发。

美国的水电比重长期停留在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主要是由于煤炭、石油、天然气資源特別丰富，便于发展火电；同时，煤炭、石油、铁路資本家和农場主等，对发展水电也常有阻碍。但是从絕對数量說，美国拥有的水电容量，現在仍然是世界各国最多的，达二千七百万瓩。美

国的水力資源已經开发的約占全部蘊藏量的百分之二十七。

从动力資源來說，我国的水力資源和煤炭資源都是十分丰富的，因而在水电和火电之間，可以有較大的选择余地。我国石油和天然气的資源还在勘查之中，目前还不能作为发展火电的根据。在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內，我国火电的发展主要还是靠煤炭。

煤炭是一种重要的物资。它是冶金等重工业不可缺少的燃料，又是一种珍贵的化工原料，将来会逐渐成为解决人民吃穿問題的重要資源。因此，我們应当逐步改变用过多的好煤来发电的不合理的情况，逐步地用更多的劣質煤和洗煤用的泥煤来发电，使今后火电的发展更合乎經濟和合理的原則。

火电的发展决定于煤炭的供应。一百万瓩火电設备的生产，每年大約需要四百五十万吨左右原煤，运输問題是一个很大的問題。我国煤炭資源的分布，北方多于南方，煤炭生产也受到很大的地区限制。长期以来，不少地方的用煤要靠华北、东北两地区供应，形成了大量北煤南調和长距离运煤的現象，而煤炭长途运输的浪费是很大的。

在一九五八年，探明了的煤炭資源的蘊藏量有极大的增加，长江以南各省也探明了不少煤炭資源。煤炭工业部門正在努力改变产煤地区分布不合理的情况，准备在南方增建新的煤炭基地，爭取各区用煤



能够逐步基本自给。但是这一努力还不是很快就能见效的。今后即使做到各地区用煤基本自给，但是在地区内部，仍然有相当的运输问题。

我国水力资源占世界第一。根据这几年进一步的调查，按平均流量共蕴藏五亿八千万瓩，加上小河流的资源，当在六亿瓩以上。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沿海各省的潮汐水力。

更重要的是，在地理位置和地形两个方面，我国水力资源有特别好的开发条件。

在地理位置方面，水力资源分布在全国各地，绝大部分工业城市都可以从水电站取得电力；估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有个别水电站的输电距离需要达到五百公里。将来修建长江三峡水电站时，送电一千公里的问题才会提到日程上来。

在地形方面，我国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是高原、台地、山脉和丘陵，河流穿过它们奔向盆地和平原，其间造成许多陡峻的坡降和狭窄的河谷。因而水电站的坝址随处可见，容易集中落差，缩小工程量。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和我国的长江，河流长度相差不大，但每公里的平均落差，长江为密西西比河的十二倍半。

水电站的造价主要受自然条件的控制，往往因自然条件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工期的长短同自然条件也有重要的关系。火电站的造价和工期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则较小，单位造价变化的幅度也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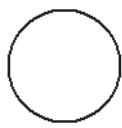
较小。

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造价高和工期长是水电建设的两个主要弱点。各国水电站每瓩的造价，一般为火电的两倍到四倍，甚至更大；工期也比火电长得多。

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我国水电的单位瓩平均造价只比火电高出十分之一，水电的平均施工期限也比火电约长三分之一。

我国水电站造价低的原因，主要是自然条件好，工程量小。同国外许多主要水电站的情况对比，我国水电站每瓩的混凝土工程量，一般只及国外的一半或者不到一半。除此以外，我国水电站造价低，也还有以下的原因：一是土建工程单价低。水电站的投资中，土建工程约占三分之二。我国土石方工程的单位价格，如以钢铁价格为共同的基数，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在混凝土工程和隧洞工程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二是施工准备工程简单，特别是南方更便于因陋就简。三是气候条件好，一年四季可以施工。再加上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使设计和施工往往能够做到最大限度地降低造价。

在工期方面，外国建设一个中型或大型水电站，总要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才建成的也不少见。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的五万瓩左右的中型水电站，自正式开工到第一台机组发电，一般约两年半；当时估计一个五十万到一百万瓩的水电站，工期在五年左右。这样的速度在



世界各国也算快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之后，中型水电站的建设时间，已缩短到一年半左右，一般大型水电站也能缩短到三年左右建成。

新安江水电站装机容量为六十五万千瓦，是用“洋法”和“土法”相结合的办法施工的，开工以后不到三年就有可能发电。而美国哥伦比亚河上正在修建的普列斯脱滩水电站，规模同新安江相仿，施工是高度的机械化，在老板的巨额奖金和罚款的鞭策之下，预计仍要五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发电。

水电站的施工最适于洋土并举，特别是在开工的初期和在土石方的处理上，可以更多地采用土办法。一九五八年开工的大中型水电站项目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八倍，施工的洋设备只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这一方面说明了水电建设中施工设备的不足，但也可见土办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我国，洋土并举是可以大大缩短工期的。当然，建设水电站一般工程量比较大，一定数量的洋设备仍是必需的。

根据上述动力资源，特别是水力资源的特殊有利情况，我们当然应该坚决执行又多又快而且能又好又省地发展水电的方针。

其次，积极开发水力资源，实现河流的综合利用。

我国许多水力资源都具有巨大的综合利用的作用。这些水力资源的开发，都能

同时满足国家当前迫切的防洪、发电、灌溉、工业供水和航运等方面的要求。因此就可以用最经济的投资取得国民经济各有关部门最大的综合效益。综合利用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治理和开发河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

洪水灾害是我国广大土地上自古以来存在的问题，几乎全国所有主要河流的下游，都有轻重程度不同的洪水威胁。长江、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等大河的泛滥灾害，是大家所熟知的。这些河流，不仅洪水发生的次数十分频繁，每次灾害所造成的损失也是十分巨大的。解放以来，我们在防洪工作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取得很大的成绩，洪水灾害大大减轻了。譬如黄河在解放后十年内遭遇了四次洪水，一九五八年黄河下游发生接近百年一遇的大洪水，都没有发生决口。又如长江在一九五四年发生的洪水，比解放前一九三一年的洪水要大得多，但受灾情况却比一九三一年轻得多。当然，为了根本解决这些河流的洪水问题，仅仅依靠加强堤防等措施是不够的，还必须修建一些具有相当调节能力的大小水库来削减洪峰。例如，经过丰满水库的调节，曾将一九五三年松花江下游的最大洪峰一万五千秒公方减至七千三百秒公方，曾将一九五七年松花江下游的最大洪峰一万七千四百秒公方减至六千秒公方。这些水库同水电站是一种孪生的关系。

我国河流开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灌



溉。由于雨量分布得不均匀，往往不能及时保证农业生产的用水需要，几乎全国的各个地区，特别是西北和华北，都容易发生程度不同的旱灾。为了解决农业用水所修建的大小水库，也同样可以结合发电。

我国河流的航运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许多河流上有险滩，枯水时更不便通航，需要对航道加以改善。水道运输是一种量大而价廉的运输方法。随着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对航运的要求也正在日益增加。水电站的修建，在上游造成水流平缓的水库，在下游则增加枯水时期的流量，这对航运是有很大好处的。当然，有的河流，在修建水电站时还必须同时修建通航设备。

工业给水也逐渐成为我国工业建设中的重要问题。钢铁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和其他许多轻重工业，在生产过程中都要耗用大量的水。火电厂在生产运行中也有很大的用水要求。水库和水电站的修建，可以担负起工业给水的任务。

此外，渔业生产的发展，也是河流综合开发中可以同时结合解决的问题。

水电站的建设同这些方面的关系，是互相结合又互相促进的。官厅、佛子岭、梅山、三门峡、丹江口、青铜峡、密云等工程，正好说明这个问题。这些工程，即使不是为了发电，也是需要修建的。去年和今年各地修建的中小型水利工程，可以结合发电的就在二百万瓩左右。如果发电

设备能够赶上去，其中绝大部分都可以很快发电。

大家都知道，河流的综合利用为国民经济带来全面的长远的利益。与河流有关的各项国民经济利益，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和工业供水之间，对于河流的开发和水量的控制、使用，存在着极其错综复杂的矛盾。如何分清主次，防止片面，使各种矛盾得到正确的解决，使各项国民经济利益都能获得必要的、适当的满足，总的效益达到最大的限度，是必须从自然界的各种条件（包括水文、地形、地质等），从政治、经济和技术各个方面，从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分项具体计算、详细比较分析和综合研究之后，才能求得最合理的解决方案。水能利用问题，即水力发电问题，是河流综合利用中情况最复杂和联系最广的问题，因为它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网电力系统（与火电的配合）、同河流水文（洪水和枯水）以及同工程结构本身的布置，都有着最密切的直接的关系。一般说来，具有较大水库的水电站，是能够统一解决各种矛盾，合理地实现河流综合利用的要求的。

第三，耗电工业的发展，要求有廉价的电源——水电来配合。

所谓耗电工业，就是指生产过程中消耗大量电能的工业。这种工业产品的制造，大都采用电炉冶炼或电解过程。在黑色冶金方面，主要是各种优质合金钢、铁合



金；有色冶金方面，主要是輕金屬系統的鋁、鎂、鈦以及電解銅；化學工業方面，主要是化學肥料和合成纖維。生產方法的改變也可以使某些普通工業改變成為耗電工業，如電爐煉鐵代替高爐煉鐵，電爐煉鋼代替平爐、轉爐煉鋼，用水電解法代替一般方法製造合成氨。耗電工業的產品是現代工業和現代國防不可缺少的。因此，耗電工業的發展水平成為一個國家工業水平和技術水平的重要標志之一。

耗電工業的產品成本中，電費占百分之二十到四十，甚至高到百分之七十。這一類工業，世界各國大都靠水電來生產。加拿大、瑞典、挪威等國的煉鋁工業，從國外輸入原料，再向國外銷售產品，這就等於輸出了水電。一座十萬噸的煉鋁廠，大約需要三十萬到四十萬瓩的廉價電力，這只有大水電站才能勝任。因此，在我國大量發展成本低廉的水電，才能促進耗電工業的發展。反過來，耗電工業的發展可以最好地同水電相結合，能夠在短期內使水電站的全部容量充分發揮作用，並且可以設法利用水電站的季節性電能，即洪水和豐水時期的電能。

這裡順便提一下成本的問題。降低成本，積累資金，是社會主義建設中必須遵循的經濟原則。不斷提高全國發電量中水電的比重，是降低電力成本最有效的一個措施；這對於降低各種用電產品的成本、加速國家資金的積累、乃至提高勞動生產率，都是有着重大意義的。

第四，水電設備比火電設備容易製造，容易得到發展。

這是由於水電設備在製造技術、金屬材料和配套設備三個方面，都比火電的要求低得多、少得多。以電站的主要設備來說，水電不需要複雜的鍋爐，也沒有高溫、高壓、高速的問題，材料上也就不需要優質合金鋼。水電設備所需的鋼材只及火電的一半，銅只及火電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而且絕大部分是用的普通鋼材；水頭不高的電站，有些部件還可以用鑄鐵，以至鋼筋混凝土代替鋼材。當前火電設備的一個難關是配套問題，這需要經過一個相當的時間和巨大的努力之後，才能逐漸得到解決。這方面，水電也簡單得多。因此，水電設備的製造比較容易推廣，一般機械製造部門都有條件來承擔。

綜上所述，從煤炭資源的情況，水力資源及其開發條件，防洪、灌溉等的綜合利用要求，耗電工業的發展，設備製造等這幾個方面來說，我國完全應當更多更快地發展水電，應當力爭在盡短的時間內，使水電趕上前去。從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來看，算一算大賬，以水電為主、火電為輔作為電力建設的一個長遠方針，是完全合理的。

關於水電的好處，我國應當多發展水電，理論上一般是得到公認的。但在當前



水电发展上的确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在认识上和措施上得到解决，对于贯彻水主火辅的方针是不利的。

当前使人们对于发展水电引起怀疑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水电站枯水年的问题。

去年东北丰满和四川狮子滩两水电站都碰上了枯水年，去冬今春发电量特别减少，因而引起了一些议论。现在将这件事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去年第四季度，正当东北严重缺电的时候，丰满出力大大降低，只能有一台机组经常运转。缺电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电力赶不上大跃进的形势。而丰满第四季度的出力降低，则是由于遇上了特殊枯水年，几个矛盾碰在一起造成的。去年丰满的年总水量只有六十九亿公方，不及多年平均水量一百四十四亿公方的一半；这是丰满有水文记载三十年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枯水，从水文上推算，是超过百年一遇的枯水。丰满水电站在过去几年中一直是东北电力系统中最主要的供电电源，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供应了将近一百亿度的电量，为国家节省了七百四十万吨煤炭；由于丰满供应了大量廉价的动力，东北电力系统的电价在全国来说是最底的，这对东北地区电气冶金、电气化工等耗电大的工业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在丰满水电站的设计中，曾考虑到遇上特殊枯水年时，最低发电量为十二亿度（设计中的多年平均

发电量为二十亿度）。这时就需要增加火电站的负担，动用电网中的备用容量，来补偿它少发的电量。去年四月初，中央气象台和丰满水电站曾经预测到要遇上枯水年，在水库调度上本来应该早作准备。可是在四月至七月间，为了满足东北电力负荷的增长，尽管来水量已经大大减少，丰满还是比往年同期多发了二亿度电。因水量收支不能平衡，把水库存水提前用掉，迫使丰满水位大大下降。到第四季度，来水更少，而且水头又很低，只能有一台机组经常运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年一年，丰满仍勉为其难，发了十六亿度电，只比设计电量少发四亿度。去年四月至十一月间，东北电网的需电量增长百分之六十，而发电设备只增长百分之十三，这是缺电的最主要的原因。

狮子滩水电站去年也遇到了枯水年，约比平时少发电百分之二十六。可是，造成水库水位过早下降，和今年三、四月间发电量严重减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去年估计当年的雨量不会少，为了避免洪水期间弃水，再加上为了降低发电成本，重庆的火电厂曾部分停止生产（一直到八月才带满负荷），让狮子滩比原计划多发了一千二百万度电。其后果是：提早用水一亿二千万公方，损失水头近四公尺，由于水头降低，损失的电量为六百三十万度。这时，狮子滩下游两线新装的水电站——下碛和廻龙寨正在装机，还没有运行，因而发生了弃水，让水不做工作，白白流走，共



損失电量一千八百多万度。去年尽管獅子灘遇到枯水，重庆地区发电设备的增加赶不上电力负荷的上涨，但是在今年二月份以前，重庆地区的供电还是基本正常的。如果能够按獅子灘原訂調度計劃正常运行，把去年早用掉的一亿二千万公方水留到今年来用（約可多发三千余万度电），并且早一些动用电网内的火电后备，早一些調整負荷，就是遇到枯水年，重庆地区今年三、四月份的电力也是不致于这样紧张的。

水电站确有一个枯水的问题。如果这个地区只有一个孤立的水电站，或者是純粹靠天然流量沒有水庫調节的水电站，那么，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如果水电站不是孤立的，电网之内还有其他水、火电站，有备用的容量，有水庫調节流量，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河流的水文情况，有丰、有枯，这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有它一定的規律。只要我們認識到这种規律，并且設法掌握和駕馭它，就不会造成大的困难或者損失。

丰满和獅子灘都是多年調节的水庫，可以对年与年之間的水量进行調剂。去年两地的来水量都比平水年少百分之五十，而由于动用了前年的存水，实际上少发的电量只是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二十六。因此，应当反过來說，这是具有多年調节水庫的水电站的一种优点。当然，动用存水，要用得恰当，不到最紧急的时候不要去輕易动用。关于水庫的調度，一方面要求在丰水期多得电能，少弃水；另一方面又要

求在枯水期保證一定的出力，以滿足用戶需要。我們应当从去年的水庫調度和水电站的配合上吸取教訓。

挪威、瑞典、瑞士、加拿大等以水电为主的國家，当然遇到过多次枯水，一般都是通过水火电合理調度和动用系統中原有的备用容量得到解决。这些國家并没有因为发生枯水而使水电建設的发展受到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仍在繼續大力发展水电。

不論水电为主或者火电为主的國家，電力系統中都需要一定的备用容量，以便在定期检修、发生事故和負荷发生意外上漲的时候，不致影响正常供电。在特殊枯水年，就能利用这种备用容量以补不足。

我国在自然条件上同上述國家有所差别：我国国土广大，气候复杂，一年四季都有降水，各条河流的水文情况很不相同。去年东北松花江上游和鴨綠江遇到特殊枯水，而黑龙江却遇到特大洪水；四川獅子灘遇到枯水年，而附近的大洪河却是个丰水年。将来水电站修多了，電力系統也有了大的发展，相邻河流的水电站丰枯水量互补盈亏，水火电配合运行，即使有的水电站遇到枯水，困难也是比較容易克服的。

当前有关发展水电的第二个突出问题，是关于装机容量和发电量的平衡問題。

目前容量和电量都感不足，而电量的



不足，更成为主要的問題。有的水电站利用小时数較少，比同一装机容量火电站，发电量要少得多。因而建設一个同样装机容量的电站，为了多得电量，在当前这样大跃进的时候，許多地方宁願多要火电，不要水电。并有所謂“两个瓦（水电）不頂一个瓦（火电）”的說法。

一个水电站装多少容量，平均年利用小时多少，是由它本身的条件和所担负的任务决定的。一般說，在一个以火电为主的系統内水电站配合供电时，常由火电站担负一天二十四小时内比較稳定的用电要求（基本負荷），而由水电站担负一天内变化較大的用电要求（尖峰負荷）。例如，官厅水电站在京津唐电力系統中，就扮演这样的角色。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担任基本負荷的火电站相比，水电站的年发电量即年利用小时就少得多，这样的配合是經濟而又合理的。如果系統中沒有水电站，而以同样容量的火电站担负尖峰負荷，不仅它的发电量和利用小时也会同水电站一样小，而且在运行技术上要比水电站增加許多困难。此外，水电站的装机容量稍多一些，还可以利用洪水期的水量，多发出一些电量，节省煤炭。这个优点是火电站所沒有的。

在以水电为主的國家中，作为供电主要电源的水电站，其利用小时数是相当高的，一般达到五千小时以上。因为它既要担负尖峰負荷，同时也要担负基本負荷。在以火电为主的國家中，情况正好相反，

作为輔助电源的水电站，其年利用小时数可能低到二千小时。这些水电站，一方面主要是担负系統中的尖峰負荷；另一方面在遇到有发生事故的危險时，也可作为备用容量之用。

我国今后总的情况，水电要逐渐增多，所以水电站的平均利用小时数不宜过低（也就是装机容量不宜过大）。但就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而言，在某些水电較少，而火电較多的地区，水电站利用小时数稍小一些，装机容量稍大一些，也还是合理的。

对于装机容量和发电量的平衡問題，还要从下列三方面来認識。一是为了适应当前国家建設的发展对电力的急迫需要，虽然火电设备的制造要消耗更多的鋼鉄和有色金屬，但是仍然必須大力发展火电设备的制造。二是对水电的电量要認真算清楚，不要偏少，当然也不要偏多。三是水电建設時間虽然比較长，初期投資也比較大，但是为了逐步增加水电的比重，在今后长期得到廉價电力的好处，就需要在安排电力建設計劃的时候，对这一情况予以必要的照顧。

在具体措施方面，水电站机組安裝的进度，应当更好地与电量的需要相适应。在目前情况下，有的新建成的水电站，机組可以分期安裝，以緩和設備供应的紧张。这样，已經安裝的水电設備，可以开始发电，同时，又为今后的发展留出了余地。



当前有关发展水电的第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水电站同工业布局如何更好配合的问题。

现在有的地方，工业发展快，电站建设慢了；也有的地方，电站建设很快，土建工程已完成，设备也将交货，可是电力用户却没有能跟上去；也有的地方，本来已经严重缺电了，反而又增加了一些耗电大的工业，使缺电更加严重。这当然不仅仅是水电的问题，而是水、火电共同的问题。但是由于水电的建设时间究竟要长些，建设地点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更大些，在适应工业布局的变化上，困难也就比火电多。

这个问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发生过。工业布局和水电配合不好的情况，是应当也是可能加以改善的。有许多工业的布置，主要决定于资源、运输、场地、供水等条件，用电关系较小，当然不能强调要它们来迁就水电。但是对于某些耗电大的工业，供电问题是这些工业选厂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尽可能地更多地迁就水电是有必要的。当然在规划水电电源的时候，也应当主动研究如何同这些耗电工业得到更好的配合。

水电和工业配合的问题也是水电的长远规划问题。水电的长远规划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都有密切关系。许多水电站的建设，不仅具有发展电力的意义，而且往往能够促进一个地区在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

业各方面的综合发展。因此，在水电规划中，一方面要有高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也要求眼光要放远大一些；一方面要尽量避免所谓“远水不救近火”，努力使水电建设和当前的需要相结合，同时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决不应忽视和放松那些关系重大的远景目标。

在去年大跃进中，水电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五个并举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下，全国在施工中的大中型水电站总容量达到一千多万瓩。这就说明，我国水电建设已经迈开了很大的一步，已经搭下了一个很大的架子了。去年水电勘测、设计、施工人员创造了许多的先进经验和革命措施，使得水电站的施工速度加快了一倍，造价降低了一半还多。当然，目前水电建设中建筑材料和施工设备是很紧张的，这种困难是我们的事业在高速前进中的困难；只要我们能在设计和施工中更好地节约原材料，继续开展技术革命，贯彻自力更生的精神，善于从过去的工作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不是回避困难，而是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我国水电建设今后是一定能够得到更大发展的。

世界水力资源的总蕴藏量约三十八亿瓩，七十多年来，已经开发的约一亿三千万瓩，主要在北美洲和欧洲；水力资源最丰富的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可以说基本上还没有得到开发。我国的水力资源目前只开发了不到千分之三。我们应当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我们这一代，首先将最



經濟的最好开发的水力資源千千万万地开发出来，讓水电站遍布全国，改造自然，造福人民。

当然，如上面說到的，水电为主、火电为輔，这是要經過长期努力才能够实现的方針，而不是在三五年之内就可以全部实现的方針。在目前，以至在今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为着适应国家建設对电力的迫切需要，我們必須积极发展火电。以为我們的长远方針是水电为主、火电为輔，就要在目前集中力量去大办水电，而忽視

火电的建設，其結果必然使我国电力的生产不能适应經濟建設高速度发展的要求，这种作法是不对的。但是，如果因为目前时期为了适应国家經濟发展的需要，多发展火电，就不認真考虑发展水电的远景规划，不充分利用我国水力資源非常丰富的有利条件，不积极进行各项有关水电建設的准备工作，不进行目前条件下可能和必要的水电建設，以便逐步提高水电在整个电力生产中的比重，这种只顧眼前不顧将来的片面性，也是必須避免的。

附：名詞解釋

容量（瓩）

容量是計算电力生产能力的标准。常用的計算单位是“瓩”，每一瓩的发电能力等于一点三六“馬力”。一个电站的发电容量(也就是它的生产能力)，决定于电站内所安装的发电机的数目和大小，所以有时又叫做装机容量。

发电量（度）

发电量是計算电力生产数量的标准。常用的計算单位是“瓩小时”，通俗称为“度”。每一瓩的发电容量每小时可以生产一度电。每一度电可以供一盞二十五瓦（瓦是瓩的一千分之一）的电灯用四十小时，或供一馬力的电动机用一点三六小时。

年利用小时

年利用小时是計算发电设备利用程度的标准。每一瓩发电设备，在一年內如果生产了三千度电量，它的年利用小时就是三千小时。如果一瓩设备全年生产了五千度电量，它的年利用小时就是五千小时。因为一年內只有八千七百六十小时，所以发电设备的最高年利用小时是八千七百六十小时。事实上由于用电需要經常有变动，发电设备还需要定时的檢修，不可能全部經常得到充分利用，一般年利用小时远低于这个最高数字。各个电站的设备年利用小时是不一样的。有的高些，有的低些，这是由电站在电力系统中的运行方式所决定的。



自动化在帝国主义国家里

——楊重光——

在美国一家罐头工厂的车间里，横列着象火车一样的半自动化车床。车床的传送带长长地连接在一起，不停地蠕动。在“火车”的这一头，一个女工两手用每分钟三百五十次、每小时二万一千次的速度把切成小片的白铁皮飞快地推送到车床上。在“火车”的另一头，一听听密封好了的食物罐头不停地跳出来。女工们被机器的轰鸣声震得头昏脑胀，刚想把两手放下来休息一下，但是拿着计时表的监工在背后吆喝着：“赶快做！赶快做！”

女工们每天九小时干着这种折磨人的劳动。当她被折磨得衰弱不堪和半瘫痪的时候，她就被资本家抛弃了。于是一个新来的女工顶替了她的位置。在这个原来有好几百工人的工厂里，实行自动化以后，只剩下几十个工人了。很多工人被新机器排挤掉了。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上有几百万失业者等候着工作做。老板们是不愁找不到年青力壮的劳动力的。

在现代生产技术飞速发展的过程中，自动化是重要的成就之一。自动化不仅能大量节省人的体力，而且生产管理中的某

些脑力活动也能被自动控制系统所代替。自动化能使劳动生产率一般增加两倍到十倍，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增长三十倍或五十倍。如果没有自动操纵，原子能研究就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水平，原子核反应堆的建造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两个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自动化却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后果。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已经永远消灭，失业已经根除，任何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都是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列宁在论述英国化学家南姆赛发明的从煤层中直接取得煤气的方法时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采用南姆赛的这种能‘解放’千百万矿工及其他工人劳动的方法，就能立刻缩短一切工人的工作日，例如从八小时缩短到七小时，甚至更少些。所有工厂和铁路的‘电气化’，一定能使劳动条件更合乎卫生，使千百万工人免除烟雾、灰尘和污垢之苦，能很快地把肮脏的令人厌恶的车间变成清洁光亮的、



人类所应有的实验室。家家户户有了电灯和电气取暖设备，就能使千百万‘家庭女奴隶’免于把一生的四分之三的时光消磨在乌烟瘴气的厨房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广泛地实现生产自动化，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劳动条件，急剧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幸福。赫鲁晓夫同志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在社会主义社会，自动化不仅有经济上的意义，而且还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在自动化的条件下，可以根本地改变劳动的性质，提高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创造条件；人的作用将归结为管理和调整各种自动机器和仪器，以及制定工艺过程的各种程序、制度。”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实现自动化的社会后果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列宁在论述南姆赛的发明的同一篇文章中说：“这一变革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与这一发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能产生的影响是绝对不能比拟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事采煤的千百万矿工的劳动的‘解放’，必将造成工人大批失业、贫困现象愈益加重和生活状况更加恶化。而从这一伟大发明上所获得的利润，将流入摩根、洛克斐勒、利亚布申斯基、莫罗佐夫一班人的荷包，以及他们的随从如律师、经理、教授之流的资本奴才的荷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是机器的奴隶，劳动人民的尊严受到最大的伤害。自动化的运

用不能不把工人从劳动中排挤出来，抛到工厂的大门外，不能不使生产过剩的危机更加严重而尖锐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广泛采用自动化和半自动化装备而来的，通常是大大加强劳动强度，因为每个工人所照管的机器增加了，机器的操作速度也加快了，工人的劳动条件更加恶化了。归根结蒂，自动化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各种矛盾。马克思说得好：“在现代的恶劣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免要加深社会的对立和加强社会的对抗。”（“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技术的进步反而使劳动人民的生存权利受到严重的威胁，自动化逼使更多工人丢掉饭碗。譬如：美国克利夫兰城一个日产一千架无綫电的半自动化工厂，一九五五年的时候雇用了二百名工人，一九五八年实行了完全的自动化，就只用四个技术人员来进行工作了。美国布雷福特城一家制造凝固汽油的完全自动化的工厂，原来有好几百人工作，现在一共只有五个工人，每天生产六十五万磅凝固汽油。这些工厂里多下来的工人到哪里去了呢？交了“好运”的到农场、小工厂打临时工去了。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只得在纽约城的失业救济所门前，在底特律福特汽车公司工厂的铁栅门外，在华盛顿的街道上蹒跚地徘徊着……。最近尽管很多工厂的烟囱重又冒烟了，但是失业的人数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

难怪最近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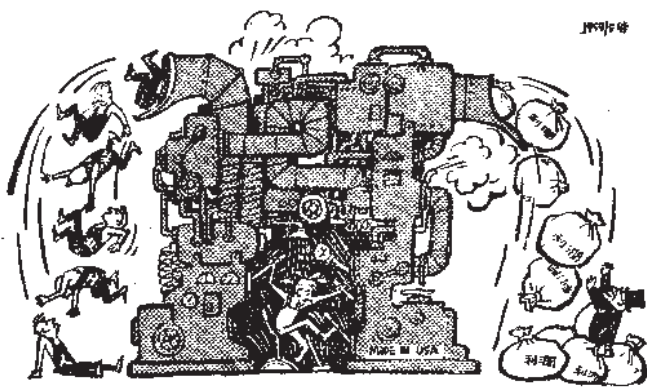


紙、刊物和广播，越来越多地談論着工厂实行自动化以后所引起的社会后果。三月三日英国“新聞紀事报”刊登一篇从华盛顿寄去的通訊中，冠以这样的标题：“再度出現繁荣(?)局面——但是机器窃走了工作”。文章承認：“这說明美国的一种残酷的新現象：在生产率上升的时候，失业人数也在上升。”又說资本家“并没有及雇工人，却是减少工人和大量进行超时工作，或是轉而实行自动化。”美国工业公司董事長斯奈德三月九日对記者說：“在現在登記失业的人中，大多数将依然失业，而且将失去受雇的可能。事实上他們的人数还要增加。技术的进步和企业单位的規模越来越大促使这种情况无法避免……。”去年美国“新共和”杂志在一篇文章中用确实的数字証明：假如在二十年的時間内，在美国全部工业系統中采用自动化的机构，平均每年只要增加百分之五，那么“每年就至少会有三百万工人失去工作”，結果将是“绝对失业和整个經濟的萧条”；即使按照目前采用自动化的速度，所造成的失业也会是“数字庞大、具有經常性而且从后果上說绝对沒有前例的。”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在自动化企业中为每

一单位产品所偿付的工資比非自动化企业要少得多，这就使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增加了，工人們受到进一步的剝削。正是在垄断资本家对利潤的贪得无厌的追求之下，在美国、英国、西德、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自动化趋势有了很快的发展。这在美国表现得特別明显。据不完全的統計，美国一九五四年購買自动化設備計三亿美元，一九五五年是五亿至六亿美元，一九五六年达十亿美元。而目前，据“劳联—产联”副主席路德說，“技术的加速度前进的运动正在繼續着”，加速实行自动化，“現在在整个美国的冶金工业、汽車工业、航空工业、紡織工业、电力工业、建筑工业——在工业的各个部門进行着。”

在自动化的工厂中，按电鈕的工作代替了大部分的体力劳动，人們通过仪表、灯泡之类来監視复杂的操縱盘。这样，照理可以大大減輕工人的劳动，但是在资本主



米谷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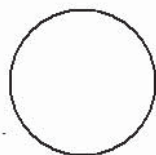


义制度下，情形恰恰相反。由于资本家追逐最高限度的利润，工人虽然是从事着操纵灯泡和管理各种仪表的工作，但是在机器速度加快的情况下，这种工作也会象最吃力的体力劳动一样使人精疲力竭。一九五六年，“纽约时报”曾用这样的话描写美国自动化车间的工作情况：“福特汽车工厂最后几根传送带上所装配的发动机，每十二秒钟就会掉落一个，在这样快的速度下，工人就只好用胳膊肘和肩膀交叉着动作，来完成这一严格规定的工作，这就活象在‘摩登时代’电影中卓别麟所演过的那个著名角色一样。”欧洲劳动生产率委员会公布法国雷诺汽车工厂自动化专家的报告说：“在自动化机床传送带上工作的技师，比一般正常的中等速度的工作要紧张得多。”美国耶鲁大学在一个关于自动化研究的报告中说：“新的机器消灭了令人痛苦的苦工，但是为了监视工作和指挥工作而需要的紧张使得工人‘神经不安、敏感’。……”资本家在工厂里推行的所谓“赶快制度”，使工人因过度紧张而产生极度的疲劳。例如法国的西姆卡汽车工厂，由于工人劳动过于紧张，以致要设立一种所谓“气体（氧气）室”，让那些被“赶快制度”弄得疲惫不堪的人恢复知觉。在法国的某些冶金企业中，为了使工人能够赶上压榨机的工作速度，竟将工人的双手捆在机器上。在这种情况下，工伤事故就大大增多。在美国，一九五六年死于工伤事故的工人有一万四千三百人，受伤的有四百三十五万人，其中有二百万人部

分或完全失去工作能力。在法国，一九五七年平均每小时发生工伤事故六百零七次，每天有八人因此死亡。意大利在一九五六年工伤事故中，死亡的达五千人，造成永久残废的达十五万九千人，受伤的有一百零一万人。由于工作过度紧张和疲劳，工人未老先衰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今年三月十六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对于年龄比较大的失业男女来说，日历是一个敌人。尽管纽约和其他各州有种种成文规定，禁止由于年龄而加以歧视，但是那些超过三十五岁——甚至有許多在三十五岁以下——的人丝毫没有减少他们这样的看法：他们最大的障碍是他们变得成熟和学到本领的那些年头。”尽管技术已经变得熟练，资本家却不願雇用三十五岁上下的“老头”。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动化也是资本家反对工人运动的一种武器。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代表之一保罗·艾因济格就说过：“用机器代替人力有助于削弱工会讨价还价的力量”。

今天，垄断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手段是更加巧妙了。四十多年前美国工程师弗列德里克·泰罗所发明的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和今天垄断资本家实行的那种“科学”制度相比，显然是望尘莫及了。这正如列宁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和科学的进步意味着榨取血汗艺术的进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日益更加发展了那些使劳动人民陷于雇佣奴隶地位的



社会条件。”

自动化象一面鏡子，从这里人們又一次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自动化帶給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后果，已經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会組織和国际工会組織的广泛的注意。一九五七年十月举行的世界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总決議中就說：“垄断組織，由于竞争与追求更大利潤的規律的驅使和促使资本主义矛盾尖銳化的工人斗争的威胁，正在工业、商业和机关內实行现代化和部分自动化（在某些国家里則实行农业机械化），其目的在于加重他們对工資劳动者的剝削，以便尽快从他們庞大

的投資中得到利益。这种情况对失业水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使工人在就业、工資、职业訓練、工业安全和健康等方面蒙受了严重的后果。工人阶级必須靠統一行动来消除技术进步带来的这些灾难性的后果，并制止过度的剝削，以便爭得較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而对着实行自动化的可怕后果，正在更加奋发起来，加强工人队伍的团结，进行反对压迫、反对垄断资本主义和爭取社会主义前途的斗争。



藏民的控訴（木刻）

李喚民作

